
超越“文化的悲剧”：在认识论和交往之间¹

约伦·索内松/文

董明来/译

摘要：阐明了在皮尔斯的诸范畴以及后期卡西尔所提出的“基本现象”中被发现的，或多或少是暗藏着的现象学，本文试图把卡西尔本人的提议扩展，以为人文科学（或者，用我们更喜欢的说法，符号学科学）奠定基础。这一尝试的方法，是对于交往之基本情况的澄清；基于布拉格学派的符号学进路，这基本情况得到了修正。在本文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考量卡西尔对于一种科学之理论的提议；此考量基于对于这个课题的第一，以及第二轮学术讨论：第一个讨论卷入了李凯尔特，文德尔班和狄尔泰，而第二轮讨论则由伽达默尔和哈贝马斯发起，虽然我们是从结构主义之产生的隐秘成果中，得出了结论；在其中，卡西尔乃是一个多少有点无意识的成员。在本文的第二个部分，符号学科学被实验性地奠基于关于常态的科学之上；这种科学的缩影，乃是胡塞尔的关于生活世界的科学：它把不同的“基本现象”展示为三种基础性的认识论操作的基础。这三种操作来自于交往行为；对于符号学科学的发展来说，交往之行为都是必须的。

惊惧于纳粹的接近，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与罗曼·雅柯布森（Roman Jakobson）登上了同一艘——其实是最后一艘——离开瑞典前往美国的船。这次与雅柯布森的相遇或许可以算是他关于“现代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Cassirer 1945b）一文的直接的原因；此文发表于1945年，他去世的同一年。并且，在此论文中被言说之物的更为深刻的原因，仍然毫无疑问地能在卡西尔本人的早年作品中找到——而且，从相信索绪尔式符号学和皮尔斯式符号学之间的简单对立的那些人的角度来看，它们会把我们带得离后者更近。但是，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关于这个故事的基本教益是，没有理由在皮尔斯（Peirce）和索绪尔（Saussure）之间作出选择。这并非是因为他们都是正确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确实是），而是因为在他们之前和之后的符号学传统，为思考提供了一个更大的丰裕（plethora）。

1 原文：Sonesson, G. (2017). Beyond the "Tragedy of culture" : In-between epistemology and communic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emiotics*, 33(3/4), 141-180.

1. 符号学科学的认识论

卡西尔的论文惜字地引用了雅柯布森，并且它几乎没有提到索绪尔。但是，它充满了对其他语言学家的引用；根据这些语言学家，语言乃是一个“关于一切事物”（*où tout se tient*）（这个词组经常被归功于索绪尔，但是其实来源于安托万·梅耶 [Antoine Meillet]）的系统，或者类似的东西。在语言学结构主义中，让卡西尔有兴趣的，毫无疑问乃是这样一个理念：部分产生于整体，并且被整体所决定。卡西尔论文的最后几页确实地考虑了“结构”这个在其他部分被用来谈论部分与整体之关系的术语之外的，另一个词：形态（*Gestalt*）。

1.1 符号学和文化科学

对于一个把康德主义的，关于经验的图式主义（*schematism*）转换为诸多类似于语言、神话、科学、历史和艺术等“象征形式”（*symbolic forms*）的思想家（Cassirer 1923-1929; 1944, 1945）而言，这么做会显得是自然的：把一个与语言学的相遇，根据我们经验之世界的片段组织起来，因为这世界乃是体现在不同语言中的，各各不同的世界观的结果。这正如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另一位与其起源更为接近的康德主义者——他的名字在卡西尔的论文中一再出现——所做的那样。并且，这似乎仍然不是卡西尔关于作为一个系统的语言的，原则性的看法。相反，他最终阐明了在结构主义语言学和居维叶（*Cuvier*）所理解的解剖学之间的类比：正如后者从羽毛得出了关于鸟的结论那样，语言学也能够从词语推演出系统。²用（没有被卡西尔引用的）索绪尔主义的术语来说，正如在语言中那样，在解剖学中，只有诸多不同之处，但是没有实证性的术语（*positive terms*）。但是，要在卡西尔身上探查出索绪尔主义的影响，却还是没有多少根基：概念的关联性的（“功能性的”）本性乃是卡西尔作品的最为基础性，也最早的“偏见”（*parti pris*）之一（Cassirer 1910），虽然这没有在他的论文中被提到。事实上，这个观念的功能属性（*functional character*）的理念，以一种非常隐微的方式出现在这论文之中；我们被告知，“精神”（*Geist*）这个概念应该在实体的意义上，而不是“在一个作为某些功能的可理解的名字的，功能性的意义上”被把握。所有这些功能都“构建并且建立了人类文化的世界”（Cassirer 1945b: 91）。在这里，功能应该在数学的意义上被理解：它有一个可以被置入一个或者多个论证的谓语句——并

2 正如我曾经通过引用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来做的那样（Sonesson 1989; 2012b），人们或许可以争辩，正如卡西尔所描述的那样，居维叶真正做的事情，与结构主义原则相反：他从部分引出整体，而不是相反。但是在居维叶必须在一个原型性的动物身体上操作这样一个程度上，这个反转仍然是不完整的。

且，这个谓语本身可能原来是一个功能。如果我们想象这个过程不确定地持续，那么我们会抵达索绪尔式的结构概念。

也是在这篇论文中，卡西尔（1945b: 91）断言，“语言学是符号学的一部分，而非物理学的一部分”。然而，这就是他关于符号学所说的一切了。这文本的主要部分被一个更为经典的讨论占据：语言学是应该被理解成“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aften*）或者“自然科学”（*Naturwissenschaften*）的一部分。卡西尔从布拉格学派那里学到了很多：他引用了尼古拉斯·特鲁贝茨科伊（*Nicolas Trubetzkoy*）在如下两样东西之间做出的区分：考量诸如声音的振动，或者发音器官的移动一类物理事实的发音学（*phonetics*），以及考量“非肉身之物”的语音学（*phnology*）。正如卡西尔（1945b: 90）所注解到的那样，后者伴随着被意义所决定的单位。依赖于一个“世界观”的，不止有世界的片段，而且还有语言之外部形式的片段：世界观乃是在思想与声音这两种无定形团块（*amorphous masses*）之间的，索绪尔式的分割的结果。因此，语音学学，以及整个语言学，乃是一种精神科学。但更重要的是，卡西尔观察到，在诸如威廉·文德尔班（*Wilhem Windelbrand*），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以及海因里希·李凯尔特（*Heinrich Rickert*）等人的作品中，有“方法论论争”（*Methodenstreit*）；在这整个论争中，“这样一个事实从未被提及：有人类的言说这样一事物，也有语言学这样一事物”（1945b: 89）。他毫不犹豫地把这认为是“一个非常令人后悔的事实，一个总是会造成后果的疏忽的罪责”。因为这被写下了，因此语言学之外的具体符号学科学——比如图像符号学、姿势符号学、文化符号学，等等——的整个序列，就生发了出来；从而，在今天，在关于知识的理论中忽视这些研究领域的结果，就变得甚至更为可怕（see Sonesson 2012c）。

1.2 超越第二个方法论论争

一个奇怪的说法是，语言学以及其他符号学领域，作为认识论实践（*epistemological practices*），在 20 世纪中叶，在新的方法论论争期间，在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卡尔-奥托·阿佩尔（*Karl-Otto Apel*），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仍然是被忽视的。事实上，这些思想家中的许多人在其他方面认为语言是重要的（这对于狄尔泰来说也是一样），但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符号学科学的特殊性。³他们没有意识到，语言学，以及其他根据这个范式

³ 阿佩尔（*Apel*）肯定是一个例外，因为他“确实”提到了皮尔斯意义上符号学，而不是从这里被接受的那个角度来看的符号学。

被建立起来的符号学科学并没有真正的与自然科学的描述或者文化科学的描述中的任何一个相符合。

不幸的是，卡西尔本人似乎也没有考虑到这种特殊性。在另一个特别地致力于对于文化科学之本性的研究的出版物中，卡西尔（1942: 63ff）反对一种简单化的对立，这种对立经常被在自然和文化科学中被作出；他并且断言说，在后者中，普遍概念也是被需要的。一开始，他用语言学为这个断言提供例证；用洪堡（Humboldt）的术语来说，语言学研究多种内在语言形式之间的不同：比如，在名词中区分阳性、阴性和中性的诸印欧语言，与那些用其他标准区分名词之类别的语言之间的不同。他从而继续讨论艺术史，并为艺术史的普遍术语找到了一个例证：这个例证是海因里希·沃尔夫林（Heinrich Wölfflin）在图像式（picturesque）和线性（linear）风格之间作出的对立。但是，如果我们按照语言学研究真实地进行的方式来思考它的话，那么它就是与艺术史极为不同的；即使我们假设，像沃尔夫林、阿卢瓦·李格尔（Alois Riegl）和欧文·潘诺夫斯基（Ervin Panofsky）这样的思想家，在把他们的普遍概念引入这个学科方面，比他们真实地实践的那样更为成功。无论语言学是在考量语言学的普遍性（mentioned by Cassirer 1945b: 83, with reference to Jakobson），还是说它的目标仅仅在（表述一个给定语言的音韵、语法以及语义规则，它都涉及某种普遍的，而非具体的事实。即使在对话分析（索绪尔主义的“言语的语言学”）这个伪装下，语言学仍然对表述普遍规则感兴趣。在卡西尔的时代，历史语言学在语言学的普遍概念中仍然显得突出；而正如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 1999）关于演化生物学所指出的那样，历史语言学肯定在某种程度上涉及了单个的事实，比如说，某种特定语言产生的日子。但是即使是在雅各布·格林（Jakob Grimm）和 赫尔曼·保罗（Hermann Paul）的先驱年月里，历史语言学也仍然极大地投身于对于语言变化之普遍规律的表述之中。即使在沃尔夫林的激进版本中，艺术史也仍然仅仅用作为规律性概念的普遍事实来研究个体事物。这就是艺术史不是图像符号学的理由。

在我几乎没有阅读过卡西尔的日子里，我提出了一个我认为能够更好地把语言学和其他符号学科学的特殊性考虑进来的提议。索内松（1989; also see Sonesson 2008; 2012c）论辩说，符号学应当被当做一种科学；它的视点可以被应用于任何被人类种族，或者更加广泛地说，被生物所产生的现象。用索绪尔的术语来说，这个立场由对这视点本身的考察构成；用皮尔斯的术语来说，这个考察与对中介（mediation）的研究是等价的。换句话说，符号学考量不同方式和构造，这些方式和构造被给予了一种手段；通过这个手段，人类相信自身能够触及“世界”。因为很多原因，在今天，似乎不可能把符号学仅仅限制于人类世界被赋予意义的方式。

即使在考察只有人类才有的图像时，我们也只有在它们与被其他动物所掌握的意义之对立中，才能理解它们的特殊之处（specificity）（see Sonesson 2009a）。因此，在此应当说，符号学是考虑不同形式的构造的：这些构造被给予了一种手段；通过这种手段被观察到的是，在生物与世界的交互中关系中，生物能够触及那个被赋予了意义的“世界”。为了避免被与行为主义（behaviourism）和某些当代版本的生成论（enactivism）的混淆，“被赋予了意义的”这个词组是必要的。后两种主义都令符号学的研究主题消失于空气中。⁴

“视点”这个术语本身当然乃是一个视觉性的隐喻。但是这个是一个立足点（standpoint）意义上的点（point），它比感觉道（sense modality）更重要。因为，在研究这些现象时，符号学必须采取人类本身的（以及它的不同部分的）立足点。确实，正如索绪尔论证的那样，符号学的对象仅仅作为这样一个视点而存在，这个视点能被运用于其他“物质的”（material）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在没有符号学对象之为符号学对象之消失这个结果的情况下，这些视点不可能被改变。类似的，有人曾经论辩说，我们应该必须接受蝙蝠的视点，更不用说蜉蝣的了；但是还不清楚的是，这个任务是否能在同一个意义上被完成。

我们采取了使用者的视点，并且试着去解释它们的具体作用；因此，我们就不能像哲学家纳尔逊·古德曼（Nelson Goodman 1968）那样，因为图像的民间概念（folk notion）的不自洽就否认它；相反，我们必须找到这民间概念的，特别的系统性。但是从这里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根据这个结论，像 路易斯·普列托（Luis Prieto 1975）所断言的那样，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研究限定于被此系统所有使用者共享的知识上；因为，为了把那些为此系统的运用奠基的先设考虑进去，在那个被使用者所意识到的，最终的层级之下，有必要下降至少一个分析的层级。符号学必须超越使用者的立足点，以解释这些知识的运作；这些运算是操作性的，虽然也是暗藏的（tacit）。这些知识为这样一个行为奠基；对于任何含义（signification）之系统而言，这个行为都是构建性的（see Sonesson 1989: I.1.4）。

进一步的，符号学投身于这样一些现象，这些现象从它们的“质性的”（qualitative），而“非定量”（quantitative）的方面被思考；并且，符号学适应于“规则与规律性”（rules and regularities），而不是适应于特殊对象。也就是说，和包括语言学在内的其他符号学科学一样，图像符号学乃是一个“规则性”（nomothetic）的科学，一个考量普遍性的科学，而不是一个“个性化”

⁴ 虽然这个关于行为的观点在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比如“动觉”[kinestheses]的概念之类），但是毫无疑问，是梅洛-庞蒂（Merleau-Ponty 1942; 1945）澄清了在行为的概念和行为主义的概念直接的不同。关于生成论，见索内松（Sonesson, forthcoming）。

(idiographic) 的科学。后者可以与艺术史以及绝大多数其他传统人类科学相比；这些科学把一组单个现象作为它们的对象，并且认为这些单个对象的普遍天性和关联性是理所当然的。⁵我想要在此坚持这种把质性和规则性结合起来的组合，因为它无视了在人文学和其他科学之间的传统分别，这种传统的区别由从狄尔泰和韦伯（Weber）到哈贝马斯和阿佩尔的阐释学传统所设定：即使是一个传统的符号学学科，比如包含了对任何具体语言之研究的语言学，也仍然卷入了对法则和规律性，而非对个体事实的建立。和语言学一样，但却与自然科学以及某些社会科学不同，所有其他的符号学科学都考虑质，而不是量——也就是说，它们对范畴的考量，比对数字数字的考量多。因此，符号学与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共享对法则之追寻以及法则性这个属性，而不是一个个性化的科学；但是，在范畴和数量之间，它保持着对范畴的强调；这是人文科学所特有的。法则性的和质性的图像符号学有一个作为其原则性课题的范畴，这个范畴的术语可以是图像性质（pictoriality），或者图像性（picturehood）。

但是，当卡西尔（1942: 65）说，在法则性和个性化这两个术语一般被给予的意义上来说，在文化科学中被卷入的一般概念既不是法则性的又不是个性化的时候，他的断言可能是正确的。他说，它们不是法则性的，因为在文化科学中，个体现象不能从一般法则中被推理出来。它们也不是个性化的，因为他们不能被还原至历史。这当然是我试着考虑进来的那个区分，我这么做，是为了把法则性和质性的符号科学从法则性和量性的自然科学那里区别开来。但是，在其他地方，在讨论一些来自歌德（Goethe）的术语时，卡西尔可能可以多少帮助我们理解被符号学科学所使用的一般概念。

1.3 原-现象（Urphenomäne）与原型（Prototype）

在他的论文《歌德与数学物理学》（“Goethe und die mathematische Physik”）中，卡西尔（1921: 27-76）开始解释，通过哪种方式，歌德的对于自然之研究的概念，不同于在卡西尔本人的时代里的自然科学的概念（它不同于歌德时代的，在牛顿之作品中有其缩影的自然科学；我相信，它也不同于我们当代的自然科学，即使在歌德时代和我们时代的自然科学概念之间，还有其他方面的不同）。他观察到，就和关心自然科学一样，歌德关心一般事实。但是，歌德拒绝把这些一般事实还原到数字。这不但是因为，正如卡西尔注意到的那样，歌德对数学理解甚少；而且更

⁵ 这并不是说，符号学的成果必须（像许多“新考古学”的倡导者所声称的那样）用亨佩尔（Hempel）的覆盖性法则（covering law）的术语来表述。我在此用“法则性”一词只是简单地表明，研究的对象由一般事实所构成。

重要的是，因为这个程序取消了我们对于自然世界之感性经验的内在属性。虽然歌德从个体转向了一般事实，但是他仍然想要呆在他能够通过他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这同一个世界里（Cassirer 1921: 71-72）。

这让人想起一个我提出的（see Sonesson 1989）区分。（以胡塞尔现象学的本质还原为范式），我区分了在自然科学中常见的量的还原，以及我称为质的还原的东西。我提出，质的还原是符号学科学特有的。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谈论还原，仍然可能是令人误解的。正如卡西尔（1921: 45ff）观察到的那样，如果量的还原适应了现象之可能性的条件，那么质的描述就留在了我们日常经验的世界中；比如说，它把意义带给了人类。确实，常识意义上的经验的世界已经被量的类型构成。正如卡西尔（1921: 57ff）同样指出的那样，“原-现象”的角色，是替换个体事实，而不是作为某种解释性的范式站在它们旁边。⁶“原-植物”（Urplanze）不是某种所有植物都可能被还原到的东西；但是当与真实的、单个的植物相比时，它就被用来显明这些植物的意义。虽然就其本性而言，原-现象是一个一般事实，它还是拥有单体物（singular）这个形式。

在卡西尔的阐释中，歌德似乎在此处预测了那个相当晚近的概念：“自然范畴”（natural categories）。根据埃莉诺·罗施（Eleanor Rosch 1975: 178），这个概念不是一些独立的，标准化的特质的逻辑联合（logical conjunction），而是有一种内在组织，这个组织存在于一个“核心意义”中。这与原型这一最清楚的例子相同，也与这样一个最好的例子相同：这个最好的例子被这个范畴中的其他成员所包围，这些其他成员的成员性（membership）的程度，是不断降低的。据说，一个被给予的范畴的诸原型，互相之间有最大限度的相似，并且与其他范畴的诸原型之间，有最大限度的不同；但是，诸范畴之间的界限却被想成是含糊的，并且，这些范畴持续地进入彼此的领域。⁷不太清楚的是，范畴的原型核究竟是由具体例证，亦即，由上面提到的“最好的例子”所构成，还是其实应该被理解成“一个范畴的抽象的表象”（Rosch and Mervis 1975: 575）。一只典型的鸟——比如说，一只知更鸟——会产蛋，有翅膀和羽毛；但是不是所有鸟都有所有的这些属性；并且，有些动物有这些属性中的一个或者一些，但是它们却不是鸟（比如说，一直蝙蝠）——但是，多亏了世界的“高度关联性的结构”（high correlational structure），作为一个例子的“有翅膀”这个属性，就倾向于与“有羽毛”这个属性，而非“有皮毛”这个属性共同出现（Rosch et al. 1976: 429）。

6 并且在这里，像在阐释学传统中是习惯性的那样，把“解释”当成是与“理解”相左的东西，也肯定是误导人的。

7 正如索内松（1989）已经提到的，并且在一些新近的文本中给出了更多细节（Sonesson 2003b; 2015a）的那样，我不认为范畴的边界真的可以是模糊的，否则隐喻会变得不可能。

罗施（Rosch）的理论有丰富的例子，绝大多数例子都来源于她本人或者她的合作者的实验。当被要求去选择一个范畴的典型例子时，人们会发现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而且倾向于选择同样的一些事物（Rosch 1973）。拉波夫（Labov）要求人们把一系列像茶杯的对象分类：在碗、玻璃杯和花瓶之外，他们找到了或多或少是典型的那些东西（cited in Glass, Holyoak, and Santa 1979: 331–332）。事实上，关于椅子和扶手椅的同类型的试验，在更早的时候就由汉斯·吉佩尔（Hans Gipper 1959）做过。乔治·拉科夫（George Lakoff）已经提出，语言充满了“模糊语”（hedges），亦即“一些语词，这些语词的任务在于让事物变得更为含糊或者不那么含糊”（1972: 195）；或者，这些语词的任务是指出一个范畴内的一个对象的，成员性的程度：举例来说，它们是“有点儿（sort of）、有几分（kind of）、大概说起来（loosely speaking）、本质上说（essentially）、最顶级的（par excellence）、在一个真实的意义上（in a real sense）、用某种说法来讲（in a manner of speaking）、从技术上讲（technically）、事实上（virtually）、一般而言（normally）”之类的词组（cf. the “adjuster-words” of Austin 1962: 73）。罗施（1975）让受试者在有模糊语的框架（hedged frame）中填入词语，并且发现作为结果的命题无法被倒置（inverted）：只有原型可以是认知性的参考点（see Tyersky 1977）。当被要求在一个与被固定在桌子中央的对象的关系中把一些对象放置在桌上的时候，受试者也可以有意义地照着任务去做。其他的实验发现，判断一个范畴名字和一个原型性的例子联系起来的命题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可以比判断一个包含了一个非典型的例证的命题更快；这些实验也发现，范畴的名字加速了下面的第一种反应，但却延缓了第二种反应；第一种反应用“它们是一样的”这句话来回应这个范畴的好的例子，而第二种反应则回应这个范畴的一些非典型成员（cf. Rosch 1975; 1978; Glass, Holyoak, and Santa 1979: 333ff）。有人肯定仍然会怀疑，是否所有范畴都有这样的形式，但是这个形式肯定似乎是一种建立范畴的自然的方式。用从德克·希拉茨（Dirk Geeraerts 2010）里借用的术语来说，原型概念本身就是原型性的。

根据罗施和梅尔维斯（Mervis 1975: 582），关于范畴的，标准性属性的实存，有一种幻觉；这幻觉来自于一种倾向，这倾向试图只去考虑一个范畴中那些最为原型性的成员；事实上可以被证明的是，这些成员拥有许多共享的属性。应当注意的，在此被描述为一个幻觉的东西，实际上与如下一个过程是一样的：追随者埃德蒙德·胡塞尔（1936; c.1938）的引导，阿伦·古尔维奇（Aron Gurwitsch 1974）将这个过程命名为理念化（idealization）；对于几何学的发明为理念化提供了例证，这种发明基于土地丈量的精神。事实上，逻辑范畴似乎对于理性思考是必要的；并且，

必须是逻辑的东西，既有有符号学的悖论（paradox of semiotics），也有一般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这些学科乃是关于知识的知识；后一种知识，正如普列托（Prieto）所说的，乃是这些学科所产生的；然而，无可避免地，它们所关于的知识在大多数时候乃是原型性的。

1.4 关于常态的科学

歌德有着他的，关于一个从人类的视点被考量的自然世界的理念；和站在他一边的卡西尔一道，有这样的理念的歌德毫无疑问地预测到了那些更为新近的研究领域；我曾经在其他地方把这些领域命名为“关于常态的科学”（see Sonesson 1989; 1994a; 1994b; 1994c; 1996; 1997）。在符号学本身内部，A.J.格雷马斯（Algirdas J. Greimas 1970: 49）提出，可以有一个关于自然的文化科学，以作为一个关于“自然世界的符号学”——从而，这种符号学考量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对于我们而言乃是自然的世界，正如一个具体的语言是我们的“自然语言”（瑞典语、英语、西班牙语、德语，等等）。⁸格雷马斯肯定是通过梅洛-庞蒂而从胡塞尔那里得到了关于一个自然世界的符号学的理念。胡塞尔设定了生活世界的概念，以解释一个基础，自然科学之范式就在这个基础之上被建立；这个世界既充当了这个范式所研究和转化（transformed）的主要的对象，也充当了那个常识性的世界——在常识性的世界中，科学家们完成他们的工作：确实，你不能把那个允许你研究电子的粒子加速器本身也在同一个时间理解成一束电子。胡塞尔的学生们，比如阿伦·古尔维奇，阿尔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梅洛-庞蒂，以及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等人，极大地扩了生活世界之概念的功能，并且用它去解释社会现实本身，而没有扩展这概念的意义。我们得把如下一个描述特别地归功给舒茨：他把生活世界描绘成“被理所当然地接受的世界”。被皮尔斯（1906, EP2: 478）所描绘的“共同心灵”（commens）似乎会是一个类似的，被共享的假设的领域。

当心理学家詹姆斯·吉布森（James Gibson）在他的作品中设定了“生态物理学”的世界，从而来解释直接感知的可能性时（对此，传统的构建主义者必须假设复杂计算），他没有直白地引述胡塞尔，但是他经常使用与胡塞尔一样的词组和例子。到最后，即使是盎格鲁-萨克逊哲学，包括认知科学，都必须理解被胡塞尔所发现的深渊，这深渊存在于当代自然科学和我们的经验世界之间；经验世界同时假设了一个“天真的物理学”（a naïve physics）以及一个“常识意义上的心理学”；这二者似乎一起构成了生活世界。在一个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和许多被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和布尔迪厄（Bourdieu）所写下的东西一样，被约翰·塞尔（John

⁸ 在这里被使用的“文化科学”这个术语，肯定不应当在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意义上被理解。

Searle 1995: 127ff) 称之为“背景”的东西似乎也会与生活世界相符合，如果在关于二者之间的相似之处这件事上，塞尔是正确的话。从一个非常不同的传统而来，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 1928）引入了“周遭世界”（Umwelt）这个概念，以作为某种被特定的动物物种认定为理所当然的世界——虽然，在一个更深刻的意义上，蜉蝣和他的同族当然根本没有把任何东西当做理所当然的选择。

历史地说，正如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 1949）所言，这一类的意义已然对定量的还原构成了“认识论的障碍”，而定量的还原则是自然科学中所有研究的先决条件。巴什拉的“关于火灾的心理分析”（psychoanalyse du feu）其实是一种社会心理学，这种心理学关于对火进行解释的早期尝试；非常奇怪地，它让人想起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 1966:63）的观察。前者把后者当做一个非常特殊的态度，这态度在火中见到形状和颜色的集合，而非“火焰之令人兴奋的暴力”，虽然化学家当然也必须超越形状也颜色。正午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歌德的被卡西尔所描述的观点也一样是特殊的，因为它停留在感知器官（包括它们社会性地沉淀下来的意义）的层次，但是它又从个体例证中抽象出来。其实，在自然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东西之外，关于火以及类似的现象的意义的研究，似乎是有空间的。在这个意义上，正如音位一样，火是一个范畴；它在一个被感知的世界中引入了分割点（discontinuities），并且把许多有几分不同的例证纳入其中。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化学公式的被先设的统一性，地狱之火以及令人感到舒适的火炉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共同的语义特性。

1.5 关于生活世界的科学以及其他科学

虽然卡西尔没有直白地把注意力集中于生活世界之意义属性的层面上，在他对歌德的科学概念的评论中，对这个层面的注意必然是在场的。但是，用更抽象的术语来说，当卡西尔（1928:138-139）描述他的“再构建的方法”的时候，他最接近这个进路；“在构建的方法”是唯一一个可以描绘基本现象的方法，而其先驱者则是胡塞尔，狄尔泰以及那托普（Natorp）。⁹

根据胡塞尔，生活世界的基本属性之一是，在它之内的一切事物都以一种“与主体相关的”方式被给予。这意味着，比如说，一个属于任何种类的事物，总是会“从一个特定的视点”，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而被感知到；通过这个角度，对象的一个部分形成了注意力的中心。在一个类似的意义上，吉布森观察到，当我们与从一边被看到的猫（the-cat-from-one-side），从上面被看到的猫（the-cat-from-

⁹ 在一个后面的小节里，我会确实地提出，卡西尔的基本现象，乃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但是，在这个具体的方面上，胡塞尔本人的贡献似乎是相当有限的。

above），从前面被看到的猫（the-cat-from-the-front）之类的东西相遇时，我们“见到”的东西在有的时候都是同一个不变的猫。对于胡塞尔而言，对于在其部分之中之整体的视见（seeing），与关于“等等之类的原理”（the etc. principle），亦即，与对我们的如下一种能力的知识相联系：在任何一个点上，我们都可以把骰子反面，或者可以绕过一座房子，以看到另一面。这个原理相似地适用于世界的时间和空间组织。在时间中，它把我们在任何时刻的期待纳入考虑；我们期待生活会继续，期待某些事情会改变，或者期待某种更为确定的东西，比如说，期待最终会有特定数量的眼睛看着骰子的被遮住的面（这是“前摄”[protensions]）；我们的这样一些知识同样也被考虑到了：在与当下时刻紧邻着的前一个时刻里，我们曾经存在过；骰子，或许还有我们关于我们在之前曾经见到过的，骰子的面的记忆，以及在其中骰子曾经出现了的环境，也同样曾经存在（“后摄”[retentions]）。

每一个在生活世界中被遇见的具体之物都与一个一般的“类”相关。根据舒茨，在家庭成员和朋友之外，其他人都几乎只被他们所从属于的那个类所定义；并且，我们期待他们有相应的行为。¹⁰再次地，在这里我们或许会想起的，既有至少是如卡西尔所阐释的那样的，歌德式的原-现象，也有后者和原型概念之间的，被修复的关系（reprochement）（see section 1.3 above）。与典型性紧密相联系的，乃是被包含在生活世界里的“规律性”，或者，如胡塞尔所说，乃是“事物倾向于在其中做出行为的典型方式”。这是一些原理的类型，这些类型实验性地设立了皮尔斯之试推法（abduction）的基础。许多“生态现象学的法则”也同样是这样一些“被未经明说地（implicitly）知晓的规律”：比如说，实体性的对象倾向于持续存在；主要的表面就其外观（layout）来说是近乎永久的，但是有生命的对象在生长或者移动是就会变化；某些对象，比如芽和蛹会变态（transform），但是没有对象会像一只青蛙变成一个王子这样，变成一种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没有实体性的对象不是从另一个实体而产生的；一个实体性的，分离的对象只能静止在一个支撑它的水平面上；一个固体的对象不能在没有打破另一个固体表面的情况下穿透后者……诸如此类。这样一些法则和规律被吉布森（1982: 217ff）所表述，也被魔法所蔑视。显然，这些规律性中的许多已经不在今天的物理学中；但是对于需要保持为一个整体的人类环境来说，它们还是必要的。这些“法则”的先设中的一些，比如说，在“我们会认为是完全不同的对象”之间的区分，也同样在基础上乃是这样一些东西：

10 这个时间意识的范式，被布拉格学派的成员，尤其是被穆卡洛夫斯基（Mukarovsky 1974）用于剧场符号学（theatre semiotics），以及文学符号学。更晚近地，这个被胡塞尔启发的范式被加拉赫（Gallagher 2005: 1899ff）运用于他对精神分裂症和自闭症的研究中。

我把这些东西称为为生活世界等级体系（Lifeworld hierarchy），以及符号功能的定义（cf. Sonesson 1992; 2000c; 2001）。¹¹

吉布森比胡塞尔更多地注意到了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世界的一般性的背景。在上百万年的演化历史里，所有动物的“地球环境”（terrestrial environment）都持续地拥有某些特定的，简单的不变之物，比如“在下面”的大地，“在上面”的空气，以及“大地之下的水”（Gibson 1966: 88ff）。地面是水平的和坚硬的，是一个支撑性的表面；而空气乃是不稳定的，是运动的一个空间，同时也是呼吸的介质，是气味和声音的一种偶然的传递物；并且在白天，对于事物的视觉外形而言，空气乃是透明的。作为一个整体，固体的地球环境乃是有褶皱的；它既在不同的层面上被山脉和小山，被树木和其他植被，被石头和棍状物所构筑（structured），又被像结晶和植物细胞一类的东西织就文理（textured）。为环境之坚硬性的结果，以及观察者本人与重力之关系奠基的，乃是观察者自身。

就像上面被提出的那样，对规律性的胡塞尔式描述与“试推法”的概念相合。皮尔斯把这个概念与推演和归纳这两个更令人熟悉的概念并置；并且，这个方法从一个具体例证推至另一个，但却不仅仅停留在个体事实的层面上：因为皮尔斯告诉我们，事实被特定的“规律性”，被一些原理所中介，这些原理被实验性地设立，或者被认作是理所应当的。在“事物倾向于做出行为的典型方式”中，某一些似乎会处于“符号”的起源之中；它们之中，绝大多数可能比那些被吉布森所表述的东西有更多的，区域性的重要度（regional import）。“符号”是在斯托亚主义的意义上的符号，亦即，是“推演”（inferences）或者“推论”（implication）。在讨论美索不达米亚的占卜艺术时，乔凡尼·马内蒂（Giovanni Manetti 1993: 6ff）区分了在“前件”（protasis）（p, 亦即“如果”从句）和“后件”（apodosis）（q, 亦即“那么”从句）之间的三种关系：当 p 和 q 在过去曾经一起出现时，有占卜性的经验主义（divinatory empiricism）；在能指之间有相似之处，或者有一个修辞性的形象把所指联系起来的情况下，有关联之链条（chains of associations）；而在有限数量的，可以被同一的（identifiable）情况之中，有被符码化了的联系（coded relationship）。

12

第一种类型当然与纯粹的感知性思考（perceptual reasoning）接近，并且可以用前摄和后摄的术语来表述；前摄是接下来可以被期待的东西，而后摄则可以被认

11 当后期建构主义者们，比如说霍夫曼（Hoffman 1998），开始表达一般法则时，他们似乎并不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与吉布森不同。但是，整体上，霍夫曼的法则似乎应用于图像，而不是感知世界。这与肯尼迪（Kennedy 1974）的法则更相似。

12 在前两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会注意到弗雷泽（Frazer 1890: 11）的关于魔法的两种原理，这些原理是根据接触法则和相似性法则的。甚至更明显的是，这三种情况令人想起指示性，相似性和规约性（根据上面的顺序）。

为是在之前已经发生的东西。同样可以说，这个类型是依赖于指示性关系的。在空间以及/或者时间中，在前件从句中被描述的东西，可能出现在那在后件从句中被描述的东西的附近。所有在时间中发生的经验都属于这个类：比如，当看到伐木工的斧头被举在头顶上时，我们既会期待在下一个瞬间，他会劈这块木柴（连续的前摄），也会有这样一种知识，知道在刚刚过去的前一个瞬间，他把斧头举到了当前的位置（连续的后摄）。在这里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规律性会是一种试推。如果仅仅是在一个无关紧要的意义上的话，那么这个术语就和皮尔斯所理解的一样（也是一个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省略的推论[enthymeme]）（see Lanigan 1995: 51-52）：并不需要多少洞察力就能够提出一个一般规则，这个规则把两个个体情形联系起来。在如下两种联系之间，当然有一种不同：1. 因为一个事件的发生，紧接着在一个更早的境遇中发生的另一个事件，因此看到伐木工把斧头举过头顶时，我们就会等待他劈木头。2. 我们会预测一个反抗会发生，因为一只被检查的特定动物的肝脏有一种特殊的形状，这种形状在上次一个有反抗出现时，也在肝脏上出现。但是，两种联系在一开始都可能建基于一种经验，这种经验是，在生活世界中，事物倾向于如何行动。只有在一个更后期的阶段，它们可以被区分。¹³但是二者都和那些在科学——以及像符号学这样的人文科学——中被表述的普遍化不同。

在另外那些他更为直白地考虑自然科学的地方，卡西尔（1910）把伽利略式的研究科学的方法，与亚里士多德式的方法相对比。后者从对于具体之物的观察开始，并根据被本质属性所规定的类型，把这些具体之物分类；这些本质的属性然后又被用来解释这些具体之物的行为。但是前者则首先为奠基性的过程设立一个解释性的范式；从这个范式中，预测被作出，并且最终被经验观察所检验。毫无疑问地，伽利略式的方法乃是今天被自然科学使用的方法，然而亚里士多德式的方法则令人怀疑地听起来很像这个方法：它被卡西尔归于歌德，并被我们归于有关生活世界的科学。追随乔丹·兹拉特夫（Jordan Zlatev），我想提出，我们需要多种方法，这些方法从而被置入对彼此的影响之中。兹拉特夫区分了第一人称，第二人称，以及第三人称的方法；但是我认为，一方面，有必要去区分进路（access）的诸方法，以及被寻求的知识种类；这二者都分为三个人称。通过这个方法，我们最终有了下面这个表格（表格 1）。

13 在表述他关于生态物理学的法则时，吉布森（1982: 218）声称，与经常被认为的不一样，孩童们并不自发地相信魔法。至少某些占卜的种类会显然与这些生态符号学的原理不同。当然，根据皮亚杰，孩童们会经历一个魔法阶段，并且人类学家们也已经找到了许多相信魔法的成年人。日常实践的生活世界仍然可能必须与意识形态的生活世界区分开来；而——工具性的，以及其他与目的相关联的行动，就发生在这个世界中。

表格 1：被兹拉特夫（2009: 178）所使用的诸科学方法，加入了在进路的模式和被研究对象之天性之间的区别

被通达的现象				
路的模式		第一人 称	第二人称	第三 人称
	第一 人称	内省	（规律化 的）同情	现象 学
	第二 人称	“主观 的”描述	对话	“客观 的”描述
	第三 人称	（外部 观察）	（外部观 察）	试验

在他关于被同情心所引导的（empathy-induced）利他主义的研究中，丹尼尔·白特森（Daniel Batson 2011: 99ff）引用了卡西尔的分，用它来为试验方法辩护；他声称这种方法与漫画类似：“一幅漫画乃是一个人工的，对某个自然现象的再构建，这种再构建经常是被简单化了的。它有所选择地强调了本质性的部分”。有趣的是，在我的一部旧作中（Sonesson 1988: 62; 1990），我比较了在文学意义上的漫画，以及被韦伯和他的追随者们所描述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s）：与理想类型一样，并且与原型不同，漫画夸大了它所表现之物的一些特性（或许在这里不那么相关的是，它还包含了那些在真实世界之对象中并不同时出现的属性）。现在，诸理想类型在学术作品中可能是重要的，但是，用卡西尔的术语来说，我们必须总是靠“再构建的方法”来回到原型的层面，因为它们被包含在生活世界中。因此，与自然科学之情形中的东西不同，在人文和符号学科学中，我们同时需要研究的理想类型式的方法，以及原型性的方法，并且我们必须总是让它们互相影响。¹⁴

2. 交往以及基础现象（Basisphenomäne）的状况

从塔尔图学派（see Lotman et al. 1975）那里得到了我的线索，我在我早先的论文中已经提出，文化和非文化可以用人格式（personal）的术语被描述为“自我”（Ego）和“他者”（Alius）之间的对立。我还提出，在这个组合之中，还应该加

¹⁴ 虽然他没有这么说，但是白特森（2011）所做的正是这个，因为他的理论章节确实可以被认为是在我们的意义上的现象学。

入“他人”（Alter），以替换另-文化（Extra-culture）（cf. Sonesson 1998; 2000a; 2000b; 2002; 2003; 2004; 2012a; 2013a）。自我、他者，以及他人从而就可以被理解为在 Schütz 的意义上的，类型（type）的最为一般的类（kind）；它们在生活世界中有其过程。¹⁵如果是这样，那么根据上一节，它们同样也是在歌德意义上的原-现象。在下一节里，我会进一步提出，最为一般的原-现象与卡西尔身后出版的著作中的“基本现象”概念相一致。

2.1 生活世界中的自我，他者，以及他人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符号学考量一些范式；在与其他文化的关联之中，这些范式由一个文化的成员为它们自身的文化所造就。最为简单的，一些自动范式（auto-model），可以被称为“正典性范式”（canonical model）；这些范式围绕着两个互相定义的术语之间的对立而被构建，这两个术语是文化和自然（非-文化）。一个基础性的非对称被建立在这个范式之中，像它被建立在其他范式中那样：自然被从文化的角度来定义，而非相反。每一个文化都把自身理解为在自身内部被规定的秩序（Order），这与那在外部的某些东西相对立；后者被视为混沌（Chaos）、无序（Disorder），以及野蛮（Barbarism）。在这个意义上，自然包含了其他文化，它们并不被文化范式承认为文化。

在其他的论文中，我已经提出，文化符号学最好通过交往的特殊状况被理解；交往既在时间中又在空间中被单体化（singularized）；在时空中，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体现了出来（Sonesson 2014; Dunér and Sonesson 2016）。然而，为了这么做，我们必须通过修改我们的交往范式来开始。即使在今天，符号学理论也或多或少明显地依赖于这样一些交往范式，它们从数学化的信息理论而来；这些范式被设计来描述少数的一些交往的技术手段，比如电报和广播，这些手段在今天已经相当老派的；这些范式也被设计来为信息的丢失设计一些补救措施：在通信过程中，信息的丢失经常发生。很大程度上因为罗曼·雅柯布森（1963）和翁贝托·艾柯（1976; 1977）的影响，在符号学内部，这个范式已经被用作所有交往类型、所有含义，以及所有类型的符号过程的范式。这个实践已经产生了至少两种对称的，同等地消极的结果：通过把所有类型的符号过程还原至大众传媒的类型，尤其是还原至被广播和电报所运用的那些类型，我们变得不能理解那些更为直接的交往类型的特殊性；并且，通过把所有符号过程视为等价的，我们也剥夺了我们理解一些复杂细节的手段：在多种技术中介加入之后，这些复杂细节也紧接着被加入了

15 我把下面这样一个发现归功于我以前的学生安娜·瑞迪卡·巴克（Anna Redei Cabak 2007）：一旦 被用这些术语定义，那么文化符号学的范畴就可能可以与舒茨的类型概念相等同。

直接交往之中。在这之外，我们甚至可以发现第三个，甚至更为严重的后果：通过把交往范式投影到各个以及每一个传递意义的形式，我们忽略了这样一些东西，它们对于所有类型的符号过程而言，乃是真正地共通的。

因为这些理由，我曾经在其他地方提出了一个交往的范式，它不把交往的操作理解为空间中的传递或是向另一种符码的翻译，而是将之理解成阐释行为：阐释行为既在接收者一边，又在发出者一边假设了一种积极的贡献；接收者有时候比发出者更多，有时候比发出者更少地被卷入。的确，交往过程的第一个结果是接收者产生一个感知的任务，接收者必须拥有完成这个任务的手段（对此进一步的内容，see Sonesson 1999; 2014）。首先，我们必须把交往的过程分割成三种行为：生产人造物的行为，让它呈现给接收者的行为，以及接收它的行为；它们不需要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和/或者同一个空间之内。这个过程的整体先设了某种被发出者和接收者共享的知识池（pool of knowledge）的存在；或者说，先设了发出者的一个知识池和接收者的一个知识池：这二者，即使在最为顺利的情况下，也仅仅部分重合。如果消息是适应于发出者的（sender-adapted），那么接收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消息的一部分，这个部分在接收者的知识池中未被给予。在另一方面，如果消息是适应于接收者的（receiver-adapted），那么发出者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消息的这样一个部分，这个部分可能可以被接收者所理解。

现在，让我们返回到在这种精神中被重新理解的文化符号学。在塔尔图学派的论文中，并且更为系统地，在罗兰·波斯纳（Roland Posner 1989）的作品中，曾经有一些零星的提议，提议分割三种东西：文化，非-文化，以及另-文化。虽然如此，在塔尔图学派的作品和波斯纳的作品中，关于分段（segmentation）的一些标准却都是不清晰，或者不令人满意的：这种分段处于这样一些东西之间，我会在这里把这些东西称为“被扩展的范式”（extended model）。像塔尔图学派会说的那样，在被扩展的范式中，另-文化是没有意义的，无论它是像塔尔图学派所说的那样，是某种“与文化相邻”（in the contiguity to Culture）的东西，还是根据在波斯纳的术语，存在于文化和非-文化之间的连续的“符号化的范围”中的某个地方。显然，如果被质地地定义，这个区分必须处于绝对的，而非渐进的不同之中。¹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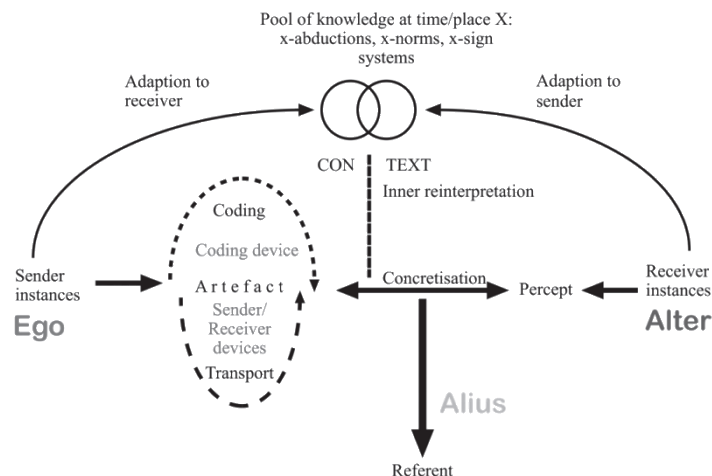
在对那些后来被称为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和第三性（Thirdness）的东西的早年讨论中，皮尔斯（由 Milton Singer 1984 所引用）用人称代词来思考他的存在论范畴。在他的《遗作集》（Nachlass）中，卡西尔（1928）

16 波斯纳（Posner）（通过与我的私人交流）提出，符号化的程度，与把某物理解为高度符码化的不同理由的数量相符合。如果我们承认，一个高度的符号化与一个高度的规约化是一样的，那么这就是有意义的；但是要计算例证的数量并且比较它们，似乎还是很难。

提出了一个基本现象的三分法，它被用相同的术语们所表达。¹⁷但是，埃米尔·本维尼斯特（1966）的分析，作为一个初次的尝试，对于我们的目的来说更为直接地有用：它卷入了一种机制；通过这个机制，主体，用本维尼斯特的术语来说，“占有了语言”——这意味着，这是一个语言“内部”的，社会-心理学的结构，而不是某种在语言之上的，被一般化了的语言学形式。本维尼斯特提出，通常被认为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代词的东西，其实应该被理解为如下两个维度之结合的结果：把人格和非人格对立起来的，“人格性的相互关系”（correlation of personality）；以及，在前一个极点之内的，把主体和非主体对立起来的，“主体性的相互关系”（correlation of subjectivity）。吕西安·泰尼埃（Luicien Tesnière c. 1954）稍晚提议，分别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更有启发性，但是也更为晦涩的术语：自为存在（autoontive），对立存在（antiontive），以及非存在（anontive）：也就是说，在自身之内存在的东西，相对于（第一个东西）而存在的东西，以及确切地说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¹⁷ 在下一节中，我会回到这个相似点。它最开始是约翰·米迦勒·克罗伊斯（John Michael Krois）（通过私人交流）向我指出的。但是，正如我们会在下面几节里看到的那样，我认为这些概念之间的不同至少与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一样重要。

从而，用这些术语来理解，文化乃是主体，或者自为存在的领域；同时另-文化乃是主体的，或者对立存在的领域；最后，非-文化乃是非人格，或者非存在的处所。与塔尔图学派的标准相联系，把非-文化描述成那个根本不真正地存在的东西，似乎尤为准确。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上的第三人称根本就不是人格，而且它也与下面两种人格相对立：那与言说者相一致的人格，以及那个与倾听者相一致的人格。用我们的术语来说，虽然彼此之间对立，但是自我和他人他都与他者对立，正如在人称代词中，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主体/自为存在 vs. 非-主体/对立存在）——在主体性的维度，这两者本身互相对立——一起（作为人格），在人个性的维度与第三人称（非-人格/非存在）相对立。另-文化，或者我们后面会用的，异-文化（Alter-Culture），乃是那个与文化有“泛泛之交”（on speaking terms with）的文化；非文化，在后面会被称为他者-文化，乃是那个最多能被言说的文化（图表 1）。在这个意义上，用密尔顿·辛格（Milton Singer 1984）的恰当的短语说，文化符号学乃是一个真正的“文化之间的对话”；但同时，它乃是一个被引导至无法触及其他文化之处的对话。因此，更正确的似乎是谈论“谈话”（conversation）或者“对话”（dialogue）的轴心（axis）；谈话把自我与他人，作为“意指”（reference）或者“命名”（nomination）之轴心相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这把前二者与被意味



的东西，或者说，与他者关联起来。

图标 1：运用了自我、他人和他者这三个术语的交往范式，改编自索内松（Sonesseson 1999）。

上图中的术语：1. 时间/地点 X 的知识池：x-试推法、x-规范、x 符号系统（Pool of knowledge at time/space X: x-abduction, x norms, x-sign system）。2. 适应于接收者的（Adaption to receiver）。3. 发出者的例证，自我（Sender instances, Ego）。4. 符码、符码装置、人造物、发出者/接受者装置、传达（Coding, Coding device, Artefact, Sender/Receiver devices, Transport）。5. 语境/文本（Con/text）。6.

内在的再阐释（Inner reinterpretation）。7. 具体化（Concretisation）。8. 他者（Alius）。9. 指称物（referent）。10. 感知（Percept）。11. 适应于发出者的（Adaption to sender）。12. 接收者的例证，他人（Receiver instances, Alter）。

从而，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与他人“有泛泛之交”，但是他者实在地只是某种我们可以谈论的东西。这或许可以用哥伦布（Colombo）和科尔蒂斯（Cortés）在征服美洲时的不同态度来说明。对于哥伦布而言，他遇到的，根本上乃是非-文化：他把印第安部落和动物、植物、黄金、香辛料之类的东西放进同一个列表——这就是说，他们乃是“资源”。他相信，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化，也没有宗教，而且他们没有语言（或者某种通用的“他人的” [Other] 语言，比如希伯来语或者阿拉伯语）。科尔蒂斯的范式主要地卷入了另文化。他第一时间开始寻找翻译官，探索印第安人的习俗，诸如此类。他利用了他从其他文化哪里学来的东西：通过让自己显示为羽蛇神（Quetzalcoatl），他让自己被翻译进了一个阿兹台克（Aztec）的“文本”之中（see Tzvetan Todorov 1982, as analysed in Sonesson 2000b）。但是，像在其他自动-范式的情况中一样，我们必须区分分段的不同标准：在知识的层面上，这种不同乃是直截的。然而，在价值的层面上，科尔蒂斯的态度在前一个分析中可能并没有多大不同。在这里，被扩展的范式如同字面上一样，只是一个“可以用的范式”（working model）。目标范式或多或少仍然保持着原样。

2.2 分支（Branching）的现象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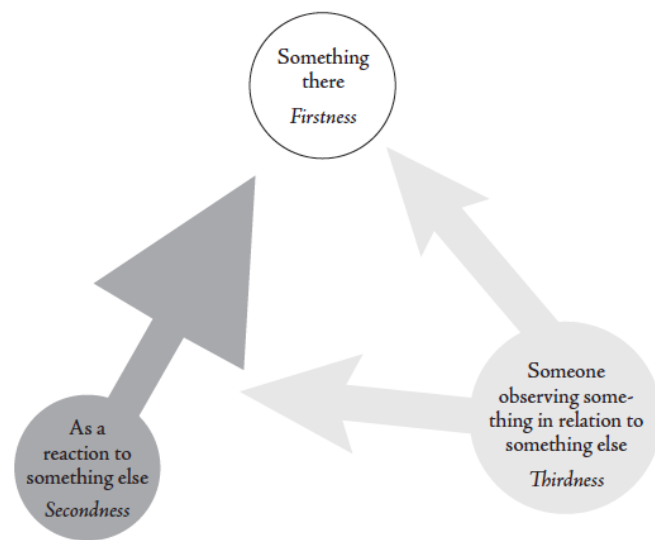
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不只是皮尔斯，而且后期的卡西尔和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都提出了对于“存在着的”（what there is）的三分法。当然，波普尔不知道皮尔斯。但是，在皮尔斯和卡西尔之间，似乎有一种间接的历史连续性，因为，虽然皮尔斯从席勒出发，但是卡西尔显然极大地被歌德所启发，而且歌德和席勒（Schiller），在浪漫主义的意义上，比任何其他朋友都多地完成了“协同哲思”（Symphilosophieren）。如果这些例证中的一个可以与自我相等同，那么这三个思想家就都似乎同意，有两种不同的他人性（alterity）。即使如此，虽然在一些时候，皮尔斯和卡西尔都把三分法和人称代词相等同，但是他们似乎不是在思考完全一样的东西；而波普尔，当然也不是。而且，或许这些区分中，没有任何一个可以与上面提到过的文化符号学的三分法所等同。

然而，在任何继续的深入之前，总结一下我早先围绕一些难以把捉的属性的试验性思考，或许是有用的。皮尔斯把这些属性称为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并且，尽管有皮尔斯和皮尔斯主义者（对它们的运用），但是它们仍然最好被理解成歌德

式的原-现象。比起单纯地是把世界必然地区分成三分的分段的第一个，第二个和第三个范畴，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对于皮尔斯而言，显然意味着更多。在其他地方，我曾经试着提炼所有皮尔斯用来描述或者举例说明这三个范畴的，不同的术语（see Sonesson 2009b; 2013b）。在第一性的情况里，这个中心性的理念似乎很难把握，但是它肯定和流逝性（fleetingness）和流动性（streamingness）有关。第二性被反应/阻力（resistance）的理念统治。而法则或者规律性倾向于是第三性的最为突出的元素。但是，我认为下面一段对皮尔斯的引用有助于展示，（双向的）阻力乃是第二性的核心：

一扇门半开着。你试着打开它。某些东西阻止了你。你把你的肩抵在门上，并且经验到了一个施力的感觉和一个阻力的感觉。这些不是意识的两种形式；它们乃是一个双向意识的两个方面。在没有阻力的情况下却要用力，这是无法令人理解的。这双向的意识乃是第二性（Peirce 1903, EP2: 268）

第二性或许是最容易把捉的范畴：它和施力以及阻力有关。或者我们可以说：既有那个对于那个“把你的肩膀抵住”某物的世界的阻力，也有那个反抗（*resisting back*）“一个阻力的感觉”的世界。¹⁸第一性只能在于第二性的对立中被理解：某物出现，带来了一个事件，抓住了那个启动了第二性之链条的注意力；在此链条中，我们生活着。因此，第三性可以指代反思，元意识，对反应的观察；作为产物，它们可能导致了规则和规律性。人们会记得，皮尔斯总是提及就第一性本身而谈论——甚至还有理解——它的困难：它需要第二性的在场。这显示了一个毫无疑问的结构主义的偏好，虽然，像我在其他地方观察到的那样（see Sonesson 2013b），这是一种三分法式的结构主义。总而言之，被理解为原型的这三个皮尔斯式的范畴，



被置入了图表 2 中。

图表 2. 皮尔斯式的三范畴，从皮尔斯对它们的多种描述中推演出来，根据索内松（2009b; 2013b）的论证。【其中的术语：1. 存在着的東西；第一性（*Something there, Firstness*）。2. 作为对某个他物之反应的东西；第二性（*As a reaction to something else, Secondness*）。3. 在某与与另一个某物的关系中，观察到某物的某人；第三性（*Someone observing something in relation to something else, Thirdness*）。】

关于皮尔斯经常被引用的生平，一个事实是，他阅读的第一本哲学著作乃是席勒（Shiller 1795a）的关于人类美学教育的书信。但是，在上面被提到的他的书中，辛格（1984）没有给出皮尔斯的三分体系（*trichotomy*）和席勒的哲学中的任

¹⁸ 这也是一个在哲学中著名的范畴，但是或许在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的作品中才是最著名的。

何线索。正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试着对它们做的提炼那样，第一性提醒我们想起席勒（1795b）在另一个文本中描述为“天真的诗”（naïve poetry）的东西；而且，第三性也让人想起他在那本书中描述为“感伤的诗”（sentimental poetry）的东西；但是，这还是让我们疑惑，该如何处理第二性。尽管如此，一些其他的论文，已经或多或少相互独立地被写了出来；这些论文与皮尔斯和席勒之关系有关，尤其提到了这三个范畴（e.g., Barnouw 1988; Wiley 2006; Dilworth 2014）。皮尔斯关于我-世界（[I-world] 第一性）和它-世界（[IT-world] 第二性）的最初的灵感，似乎明显来自席勒的“质料的行为”（Stofftrieb）和他的“形式的行为”（Formtrieb）之间的对立；然而，为了汝-世界（THOU-world）的综合性功能，席勒的“游戏行为”（Spieltrieb）必须被考虑进来。但是，如果你回到席勒（1795a）的作品本身，在他的“质料行为”和他的“形式行为”之间的对立，似乎比感性（sensuality）和理性（rationality）之间的对立包含了更多的属性（as suggested by Dilworth 2014: 43–44）。另一件不太明显的事情是，席勒的“游戏行为”是否可以解释皮尔斯式的第三性，或者是否可以反过来。我们之所以不会在这篇论文中进一步追寻皮尔斯和席勒之间的关系，有至少三个理由：第一，无论是什么让皮尔斯开始思考基本范畴，基于他身后出版的著作的情况，要搞清楚这个源初的灵感对于他的后期著作的重要性，是不容易的。第二，我们当下的任务，不是传记。第三，最重要的是，席勒的区分依赖于非常基本的直观，而皮尔斯的也一样（并且，像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卡西尔的也是）；而且，在相当独立于后者的可靠性的情况下，考虑前者的可靠性，似乎是必要的。除了皮尔斯与伊曼努尔·康德之间的明显的关系，熟悉皮尔斯和席勒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助于解释他的范畴理念；而且，让皮尔斯式的范畴与另一个康德门徒卡西尔的范畴相遇，也可能是有帮助的。

2.3 回到基本之物：生命，行动，以及劳动

至少根据某些定义，他人性的最为一般的意义，似乎被包含在皮尔斯的第二性这个概念里：和在他之前的巴克利（Berkeley）、德斯蒂·德·特拉西（Destutt de Tracy）和曼恩·德·比朗（Maine de Biran），以及在他之后的萨特（Sartre）类似，皮尔斯把我们的对于现实的感觉（sense）等同于阻力，亦即“这个被施加了行为的感觉，它是我们对于现实之物的感觉”（Peirce 1894, EP2: 4）。用那三个人称代词来说，这解释了，在皮尔斯早期的三分体系中与后期的第二性概念相符合的，是第三人称，而非第二人称。但是，唯有当我们记住，对于皮尔斯来说，他人从来不是与自我对立的東西的时候，这才会变得自明。这对立肯定和黑格尔-萨特（Hegel-Sartre）传统中的那个对立不一样，而且甚至也不是在巴赫金式概念里的，更为一

般的意义上的对立（see Sonesson 2000b）。第二人称其实是一个造成和谐的影响（harmonizing influence）。然而，基本的问题是，他人从而被给予了这样一个功能，这个功能后来被分配给了第三性。和那个我在其他地方批判过的实用主义的范式类似，他因此就给出了一个交往的情形；在其中，说话者、倾听者和指称物在没有任何中介的情况下与彼此相遇。既和实用主义者们，又和巴赫金（Bakhtin）的圈子类似，这个范式倾向于把符号系统还原至与他人的交互关系（Sonesson 1999）。除了第二人称（这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他人，因为他和自我处于和谐之中）和外部世界中的他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他人。

据我所知，皮尔斯从来没有把他的后期三分理论和三个代词相联系；但是即使他果真这么做了，我想，他应该也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如果第一性保持着与“无限的冲动”的亲近性，那么自我和他人就会基本上属于这个类型。但是，作为一个他人，作为一个交谈中的伙伴，他人已经是第二性的一个种类；正如对于他人而言，自我也是第二性的一个种类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和外部世界一样，在意指的世界中，他人也是某种抗阻（resist）了我们的东西，而我们则抗阻了它。但是，符号也必须参与到第二性中来，即使符号属于法则之天性，从而也属于第三性；因为所有的符号学结构都对我们参与交谈的可能性，以及，最终地，对于我们存在的可能性，施加了限制。

在这个阐释中，三分理论粗略地与波普尔的更广为人知“三个世界”概念类似，但是它们有不同的编号顺序：第一世界与第三人称，亦即，与意指的领域相符合；而第一和第二人称都属于第二世界。然而，但是第三世界却与皮尔斯式的第三性属于同一类型：它卷入了这样一种一般性，这种一般性是独立于有机物的（organism-independent）再现的结果（Popper 1972）。在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学，以及在后期马克思主义的作品里，这也被理解为客体化（objectification）或者物化（reification）：它们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转化为各自独立的人造物。在一本他在瑞典时写作的书里，卡西尔（1942：113ff）更多地反对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而不是反对马克思主义者们；他论辩道，这样一个客体化的过程不止是一个消极的现象，不止是一个“文化悲剧”：实际上，它恰恰是文化之可能性的条件。

在他的《遗作集》中，当更为后期的卡西尔用三种人称代词定义三种基本现象时，客体化被鱼第三种现象相等同；这个现象是“‘它’的现象”（das Phenomän des Es），它紧接着“我-现象”（das Ich-Phenomän）和“‘你’的现象”（das Phenomän des Du）。然而，所有这些基本的现象都有它们的名字；这些名字在某些时候都可能

显得与它们真正的意涵（purport）：因此，举几个例子，按照数字顺序排列，它们代表了“生命”（Leben），“劳动”（Wirken），以及“作品”（Werk）。

第一人称，亦即同样也被描述为“生命”的“单体”（Monas），毫无疑问的与皮尔斯（还有席勒）的“无限的冲动”接近。用被卡西尔引用的歌德的话来说，它是“生命，以及单体围绕着其自身的旋转着的运动”（Das Leben, der roterende Bewegung der Monas um sich selbst），是“行为”（der Trieb），亦即某种乃是“内在的无限性”（innerlich Gränzenloses）的东西。“单体”这里应该被认为是与莱布尼茨（Leibniz）的单子（Monad）有关的，后者乃是一个反映了整体的微小的部分。在这个意义上，它在空间上乃是无限的。作为一个冲动，它也显示为是无限地地情感性的。根据卡西尔，它也是“意识之流”（也是胡塞尔用前摄和后摄的术语描述的同一个意识）。有趣的是，卡西尔（或许歌德在也已经）甚是把关联性的属性带给了第一性；因为第一性不是皮尔斯概念里的关系，因此它呈现为一个单纯的潜在。但是，这个被卷入的关系乃是一个与它自己的关系：单体围绕它自己的运动。通过把这个与意识之流对比，卡西尔或许想要提出，这个旋转运动的实践的实例，乃是对于前摄的前摄，对于后摄的后摄，对于后摄的前摄，以及对于前摄的后摄——正如保罗·利科（Paul Ricœur 1990）所说，这一切造就了那作为“同样的东西”（idem）的自我，那在它所有的持续的展开中与自身保持同一的自我。

比皮尔斯的定义更为明白的是，第二人称并没有通过其自身而被卡西尔定义，而是恰恰被定义为相对于第一人称的第二个东西：它包含了“劳动”以及“整体生活”（Zusammenleben）；它们都只能处于与第一人称的关系之中。¹⁹然而，它同样也是“作用于与反作用”（Wirkung und Gegenwirkung），这正和皮尔斯式的第二性一样；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第二性并不考虑第二人称，而是考虑第三人称。如果我们从歌德的引文开始，那么实实在在地，第二个基本现象并不必然呈现为与另一个人格相关：它乃是“生命性-运动性的单体的影响，这个单体处于外部世界的周遭给予中”（das Eingreifen der lebendig-beweglichen Monas in die Umgebung der Aussenwelt）；换句话说，它是与自我和外部世界的相遇；这相遇被自我积极地完成，但是也同样地造成了自我对它自身的界限的认识（“意识到外部的界限”[“als ausserlich Begrenztes gewahr werden”]）。因此，对于歌德而言，第二个元素乃是向我们施加限制的东西；在另一方面，和皮尔斯（在上面一段的引文里）所做的有一样，卡西尔似乎把第二个元素与互相限制（“作用于反作用”）相等同。与皮尔斯不同，

¹⁹ 在皮尔斯的概念中，第二性和第三性当然是关系；它们分别从第一性和第二性开始：因此，在当下的情况下（皮尔斯的第三性，但是卡西尔的第二个元素）不是他人，而是与自我相联系的他人。但是，重点所在似乎仍然是被添加的那个东西。

歌德没有区分你的情况和我的情况；每一个人都是他自身的单体。但是，在把第二个元素描述为“整体生活”时，卡西尔显然放弃了歌德的对于自我的排他性的视角。

最后，第三人称根本不与任何人称相符合，而是与那个被概括为“作品”的，我们的客体化的世界相关。卡西尔从歌德那里引述了下面一个关于第三个基本现象的描述：“那个与外部世界相对立的，作为行为和行动，作为语词和文字而被我们所提出的东西；这更多地与世界而不是我们本身相关”（*Was wir als Handlung und Tat, als Wort und Schrift gegen die Aussenwelt richten; dieses gehört derselben mehr als uns selbst*）。然而，歌德似乎强调这个描述的第一部分，而卡西尔则强调它的第二部分。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歌德而言，第二个基本现象乃是自我对他自己的界限的发现，但是对于卡西尔而言，这个现象乃是一个限制，这个限制在从自我到他的他人的方向，和在反过来的方向上，都起作用。但是，对于歌德而言，第三个元素乃是一个手段，通过它，我们引入了世界中的变化。在另一方面，行动、影响以及意志被卡西尔用来把第二个基本现象描述为诸如“行动-以及意志的-时刻”（*Aktions-und Willens-Moment*）之类的东西（Cassirer 1928: 179）。卡西尔似乎把注意力集中在歌德的这个观察上：来自我们的东西，更多地与世界，而不是我们有关。因此，它变成了“作品”，变成了某种超越了个体的东西。它变成了抽象的结构，变成了人格之间关系的一个异物；这超越了“文化的悲剧”，并且为不能被经验到的东西创造了中介——这是早期卡西尔的“象征形式”。第三个基本现象可能或许显得是与皮尔斯对于第三性的描述相符合的；他把第三性描述成规则、法则，或者规律性。然而，对于早期皮尔斯而言，第三性指代第二人称——或者说，自我和他人之间的关系。它从而与交互关系相符合：用索绪尔的术语来说，它乃是“言语”，而不是“语言”；或许，用另一个更好索绪尔式的术语来说，它是“交互”（*intercourse*）——这个术语被索绪尔用英语所引用，且与它在今天语境里的性暗示无关。即使在后期皮尔斯哪里，也没有与卡西尔的第三基本现象相符合的清晰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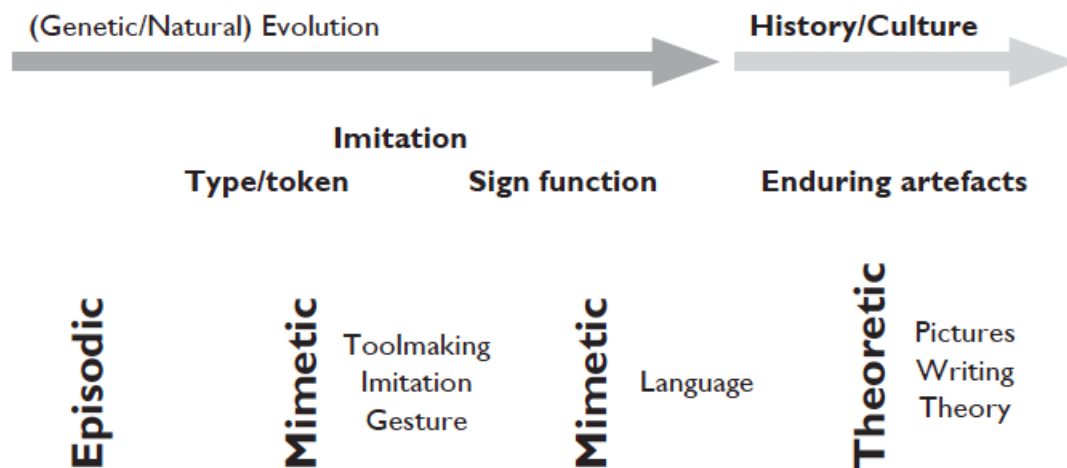
所有这些都让人想起某些在最近的认知科学中变得流行的概念。第一，是“肉体化的心灵”（*embodied mind*）这个概念（Varela, Thompson, and Rosch 1991; Krois 2007; Thmposn 2007）；根据它，我们也通过身体思考。这个理念在胡塞尔的后期著作中经常在场，但是它是在梅洛-庞蒂的作品中变得更广为人知的；有趣的是，梅洛-庞蒂是鲁汶胡塞尔档案馆的第一批勤勉的学生之一。“情景化的认知”（*situated cognition*）这个理念声称，我们的认知过程并不只内在于我们的大脑。在推动被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和大卫·查尔默斯（David Chalmers 1998）称为“有广延的心灵”（*extended mind*）之物的认知过程方面，环境扮演了一个积

极的角色。在胡塞尔的作品里，这作为生活世界的理念而在场；生活世界是被认作理所当然的世界，并被 古尔维奇（Gurwitsch）扩大为多种不同社会-文化的生活世界。对此，我们可以加上被称为“被分散的认知”（distributed cognition）的东西：我们利用我们的环境和工具来提升思考；我们还把我们的理念和记忆置入东西：置入书籍、电脑，等等。胡塞尔首先在他对于几何学之起源的研究中提出了这个理念。尽管如此，这些理念通过新的名字的再度活跃，对于关于它们的思考来说，一定是有用的。被用这种方法理解，卡西尔的“作品”与情景化的认知亲近，然而他的“整体生活”则让人想起“被分散的认知”。

表格 2：在与（在洛特曼等人的意义上的 [Lotman et al. 1975]）积累的本性之关系中被分析的唐纳德的记忆类型，与皮尔斯和卡西尔的范畴相联系（改编自索内松 [Sonesson 2007b]）

记忆的类型	积累的类型	肉体化的类型	皮尔斯式的范畴	基本现象
情景的	注意力的范围（时间/空间中的事件）	——	第一性	生命
模仿的	被自我和他人共同拥有的行动序列	自身的身体	（伴随着第二性的第一性）	行动的交互关系
神话的	被自我和他人共同生产的变动的人造物	在自我和他人之间的交互关系中	（伴随着第二性的第一性）	交互关系
理论的	被自我和他人共同外部化的持续的人造物	在与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中外在	第三性（伴随着第二性的）	劳动

在下面，我想要提出一个尝试性的比较，它比较皮尔斯和卡西尔的范畴，也比较被 梅林·唐纳德（Merlin Donald 1991; 2001）（表格 3）所描摹的人类演化之阶段。根据唐纳德，“情境性的记忆”（episodic memory），亦即对于被情景化的单个事件的记忆，乃是某种人类与许多其他动物共享的东西。模仿性记忆（mimetic memory）则仅限于人类和他们的先行者，比如说“匠人”（Homo ergaster）以及/或者“直立人”（Homo erectus）；或者，不如说这是一种对于模仿性记忆的，特殊的人类式的变体，它卷入了对于他人的模仿，而且也使用了作为交往的手势。唐



纳德的下一个阶段，“神话式的记忆”（mythic memory）与语言相对应，并且从而已经要求了使用符号的能力。在此，唐纳德选择了“神话的”一词，因为它卷入了对于叙述的建构，这毫无疑问地被用来叙说神话，并且被唐纳德思考成至少是语言之所以被演化出来的诸多原因中的一个。但是，只有在被唐纳德称为“理论文化”（theoretic culture）的第四阶段中，历史才开始了它自身的阶段。根据唐纳德，图像、书写，以及理论乃是三种典型地展开了这个阶段的，人类的产物。

图表 3：伴随着一些被符号学所启发的附加物的，对于唐纳德的演化阶段的描述。【术语：1. （基因的/自然的）演化（Genetic/Natural Evolution）。2. 历史/文化（History/Culture）。3.模仿（Imitation）。4. 类型/指代物（Type/token）。5. 符号功能（Sign function）。5. 持续存在着的人造物（Enduring artefacts）。6. 情境性的（Episodic）。7. 模仿性的、制造、模仿、手势（Mimetic, Toolmaking, Imitation, Gesture）。8. 模仿性的，语言（Mimetic, Language）。9. 理论性的，图像，书写，理论（Theoretic, Pictures, Writing, Theory）。】

索内松（2007a; 2007b）提出，作为不同种类的记忆，唐纳德的图式中的四个阶段有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的属性（表格 2）。在唐纳德的意义上，情景性记忆（不应该把它和对这个术语的早期使用相混淆）最为清晰地乃是“去肉体化的”（disembodied）记忆：注意力的范围有远，它就能走多远。它可以指向一个身体的行为，比如说在一个容器类型的对象里走进或者走出；但是它不能把这个移动一般化，并且超越一个具体的时刻和地点，并且因此，它也就并不导致任何种类的独立的肉体化。模仿性记忆仍然在主体本身的身体中积累；但是唯有在下面这个程度上，它才成为如此这般的：在这个程度上，被记录在身体里的东西也存在于其他的地方，在至少另一个身体里（或者，在同一些情况里，可能也存在于其他的运动着的人造物里）；这先设了一般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先设了“类型化”——类型化乃是对于一个类型的创造，这个类型指向了在不同身体中得到例证的，不同的标志（token）。从而，作为标志，它们存在于身体之中；作为类型，它们被不同的使用者分享。在这个意义上，类型化并不要求符号功能，但是却毫无疑问地是符号功能的先决条件：最为可能的其实是，正是在这个阶段里，符号功能才出现。

神话式记忆又是不同的：它有一个独立的尊在，但是，和一些真实世界中的细胞外质（ectoplasm）类似，为了让这个存在被维持，它需要起码两个意识（这些意识毫无疑问必须被身体化）的合作努力。作为口头语言，或者作为人行道上高跟鞋的声音的，变动的人造物，唯有在一个发出者和一个接受者大概地同意它们是什么东西的程度上，才获得了一个身体。只有理论式记忆有一个它自己的特有的身体：它独立于任何有肉体的意识之在场而持存（subsist），因为它自身就是肉体花了的。对此，唐纳德（2010）自己的术语乃是“族外婚”（exogram）。当然，在没有人可以感知到它的情况下，独立于有机物的记录是毫无用处的。没有任何人类的在场，它们实在比那个从树上掉落的橡果更差；在后者的周围，没有任何可以听到它声音的人。

2.4 他人性的被扩展的领域

卡西尔的“作品”这一术语可能与在奥古斯托·蓬齐奥（Augusto Ponzio）的理论中扮演了如此一个重要角色的“劳绩”（opus）这个概念（在这个理论里，这个概念似乎同时来自于罗西·兰迪（Rossi-Landi）和列维纳斯（Levinas）等价：它是对于自我（或许还包括它和他人的关系）的外部化。奥古斯托·蓬齐奥（1993）确实地谈论了仅仅是“相对的他人性”（relative alterity）的一个例证的他人。在另一方面，“绝对的他人性”（absolute alterity）似乎有时候卷入了物质世界，有时候又卷入了符号的世界或者说劳绩。在我看来，两个描述都是正确的。对于我们的人格

性的存在，物质世界和客体化的世界都比如此这般的其他人格施加了更多的约束；可以说，相比于谈话这一形式，它们不是那么的可商议。

但是，如果用日常语言来表述蓬齐奥，那么像“作品”、“劳绩”，或者“工作”（*œuvre*）这样的术语，就都表达了对于一个具体的自我的外在化；从而，举例来说，它们就是是一个作者的书写，是被归于一个具体艺术家的作品，甚至，在一个极端上，是一个工匠的手工艺品，而在另一个极限上则是一个著名人士的签名或者手印。²⁰它似乎并没有包含可以被我们称作集体外在化（*collective exteriorisations*）的东西，比如说语言系统，比如说在一个具体文化中被一个工匠所遵守的法则，比如说没有被写下的法律，还比如一个具体社会来的典型的行为模式，诸如此类。但是，卡西尔（1928: 155ff）固执地认为，他的“作品”这个概念也应当包含这些现象。同样必须记住，这个作品概念，用卡西尔的术语来说，不但包含了像塑料艺术这样的有物质实存的东西和“像法律和国家这样的非物质的东西”，而且也包含了像语言这样让创造成为可能的诸结构，以及像文学作品这样的运用这些结构所产生的结果。对于很多目的来说，这样一个广义的概念可能显得是没有多大用处的。但是，它确实有助于为符号学的研究主题解除限制（*delimit*）。

在另一方面，很难接受卡西尔（1928: 147 ff; cf. Verene 2001）本人的这样一个提议：他提议把三种基本现象和被布勒（Bühler）提出的符号的三个方面等同起来：表达毫无疑问地第一个现象相关（但是这是某人向另一个某人的表达，从是行动，亦即，第二个基本现象）；而召唤（*evocation*）必然卷入了处于与第一人称之关系中的他人（但是，如果召唤是成功的，那么他人会被召唤为一个第一人称）；但是，真正成问题的，是在第三个现象和布勒的再现（*representation*）功能之间的等价。后者似乎没有以任何一种比其他两种功能更为本质的方式卷入符号。他其实考量了我们经验之世界的他人性，考虑了指向性，而不是作品的客体化结构。它与皮尔斯的（与第三人称代词相应的），根据其最为有限的阐释的，第二性更接近。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皮尔斯的三分法和卡西尔所说的基本现象之间，没有简单的相应性：在对于自我而言是异物的，广义的阐释中，第二个和第三个基本现象必须与第二性相关；第二性向自我提供了阻力，并且也被自我所抗拒；当然，我们经验的世界，亦即指向性的领域也是这样；这世界更明显地乃是皮尔斯式的第二性（第三人称代词）。在三个基本现象和文化符号学的三分法中，也没有任何简单的翻译。自我最为直截地与第一个基本现象相等同。当被理解为与自我有交互关系的其他人格，而非包含了从自我发出的行动时，他人乃是第二个基本现象。当通

20 像拜耳（Bayer 2001）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work”应该被理解成德文的（在一个文化工作[*cultural work*]的产品这个意义上的）“作品”（*das Werk*），而不是（在劳作或者耕作意义上的）“劳动”（*die Arbeit*）。

过某种方式被理解为第三个基本现象的展开时，他者乃是另一个人格；但是，像被卷入对于自我的阻力时那样，它仍然形成了第二个现象的一个部分。显然地，有必要更加深入地探索他人性的领域

但是，现在我只想通过引述三种认识论操作来作总结；我们在本文的第一部分把这三种操作区分为交往情形的三个维度：导致了内省和现象学的认识论操作的，乃是朝内转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的行为；而规律性的同情的起源，则是交谈；然而，整体上，对于世界的日常的感知对于试验的认识论操作（表格 3）而言，乃是有责任的。

表格 3.表格 1 的一个扩展版本，把生活世界的操作与相应的科学理论的操作联系起来

意识的模式	生活世界的操作	进路的模式	现象的进路	科学的操作
第一人称	自我知识	意识	自我知识，本身的经验	口头报告分析法（protocol analysi），内省
	（反思）	意识（意识的想象的变体？	不变的结构：感知、符号功能、规范性，等等	现象学
第二人称	同情	与他人的关系	其他人格，动物，交互关系	规律化的同情
	（反思）	意识 vs. 他人	不变的结构：自我/他人关系，对话，交互不安息，等等	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
第三人称	观察	外部观察	被人工地构造的情形，神经过程	试验、大脑成像（brain imaging）、电脑模拟（computer simulation）、纵向研究（longitudinal

				study)
--	--	--	--	--------

3. 关于交往的三种科学：修辞学、阐释学、符号学

起码有三个学科想要建立关于交往的科学，或者，用最近流行的（但是其历史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术语来说，交往学（Communicology）：它们是符号学、阐释学，以及修辞学。在前此的讨论的基础上，我会提出，在如下一个意义上，这些学科可以被认为是交往学的三个方面：“对于在其全部符号学和现象学展开中的，人类话语的研究；这些展开关于在其他人和他们的环境之世界中的，有肉身的意识以及实践”（Lanigan 2010）。

和符号学类似，修辞学和阐释学可以被理解为寻找科学状态的，古老的研究传统。修辞学的情况当然多少与其他的不同：在古典时代，它乃是“知识”（epistemé）的一个类型（这是一门科学，而不仅仅是一门手艺，一项“技艺” [techné]）；而且在中世纪，当它是“三艺”（trivium）中的一部分时，甚至在此之上，起码直到启蒙时期，当，比如说，维科（Vico）乃是一位修辞学教授的时候，它也仍然是这样。更晚近地，它在此成为了在大学中占有一个位置的一门学科，虽然在今天，它倾向于被还原为一项在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技艺，亦即，仅仅是一套被教授给学生，但却不被质询的实践性的认识，而不是像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那样，是把这项手艺转化为明白的知识的科学。唯有在佩雷尔曼（Perelman）学派和列日学派这两个新修辞学的，富有符号学知识的比利时学派中，修辞学才多少呈现出科学的气象。²¹

至于阐释学，当它第一次在晚期古典时代，然后有一次在中世纪出现时，它当然是一种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手艺；它由阐释宗教文本的一系列教条组成；在宗教文本之外，古典正典也稍晚一些被添加了进去。另一方面，在文艺复兴意义上的阐释学仍然是一项技艺，但却被历史和批判研究所滋养，让朝向真实文本的回归成为可能。然而，至少从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和狄尔泰开始，阐释学似乎更多地被转化成了一种哲学传统，尤其染上了被海德格尔式的思之概念的颜色；虽然，主要归功于哈贝马斯的贡献，它也同样在社会科学中有了它的地位。有趣的是，在晚近的阐释学传统中（或许最为明显地在伽达默尔的作品中），阐释学和修辞学已经显示为某种姊妹学科，虽然一般而言，关于后者只有很少的言说。²²

21 关于修辞学的历史，见（比如说）康利（Conley 1990），以及迈耶（Meyer 1999）。

22 一个对于阐释学传统的广泛的综述，见费拉里斯（Ferraris 2002）。

我想要提出，这种姊妹关系可以更为方便的被扩展至第三个成员：自然，这第三个成员就是符号学。作为结果的三位一体并不是被波普尔（Popper）提出的那个（甚至更不是被皮尔斯提出的那个）：阐释学和修辞学都考量波普尔的世界 2，亦即主体的世界，但是符号学当然主要地考量世界 3，那个独立于有机体的人造物的世界。与之相反，修辞学、阐释学和符号学在与交往过程的关系中，占据了不同的位置。它们可以说是对于交往过程采取了不同观点的，关于交往的科学。因此，我认为它们可以更为合适地被描述为与被卡西尔所限定的不同基本现象相符合。

正如在上面被提出的那样（see 2.1），交往过程的第一个结果，乃是产生接收者的一个感受人物；接收者有完成这个任务的手段。如果消息是适应于发出者的，那么去发现没有在它的知识池中被给予的这个消息的部分，就是接收者的任务。这是一个典型的阐释学人物。在另一方面，如果消息是适应于废除这的，那么去发现这个消息的可能被接收者所理解的部分，就是发出者的任务。基本上，这是一个修辞学的操作。当然，修辞学也有关于对消息的这样一些要素的寻找：这些要素对于接收者来说不但可能是可理解的，而且还是有收福利的；但是说服乃是（在某种意义上）基于理解的。这里也可以有一个相应的解释学操作，如果解释学被理解为包含了对于最好的阐释的发现的话。

更简单地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修辞学考量创造消息的方式，以便赢得他人的附和；而阐释学则被卷入了发现他人想要说的东西（或者一个具体的作品可能用被用来意味的东西）的任务。在自我和他人的位置之间，符号学需要阐明，什么资源是交往过程的两个参与者都拥有的。然而，如果修辞学、符号学和阐释学乃是姊妹科学，那么要求符号学去照顾另外两个姊妹就是有意义的。一个被符号学信息所充实的修辞学会询问，在我们可用的东西中，有什么手段可以用来获得他人的同意。类似的，一个被符号学信息所充实的阐释学会询问，有什么信息可以用来理解一个特定发出者以及/或者一个特定作品的意义。

是否可能有某种类似于被阐释学的以及/或者修辞学的信息所充实的符号学？我并不这么想。作为研究传统，阐释学和修辞学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符号学家。但是它们不能在任何本质的意义上，以符号学重新定义阐释学和修辞学的方式重新定义符号学。这是因为，作为与传统阐释学（至少与有些时候被称为主体性传统的东西）不同的东西符号学观察到，如果不通过被一个特定的社会所给予的符号学资源，没有人可以被理解。以同样的方法，符号学指出，与在今天经常被实践的那种修辞学不同（虽然在精神上它也起码与一个经常被批判的，从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的修辞学传统相一致；这个传统被限制为对于表达装置，或者对于“演说” [elocutio] 的分类学），如果不通过被一个特定的社会所给予的符号学资源，则没有人可以表

达自身。这意味着，不但交往只有作为在发出者和接受者，在发送者（addresser）和收信者（addressee）之间的交互关系中才成为可能，而且即使是这个交互关系唯有通过符号和其他意义的中介才能产生。但是这些意义其实是那个同时超越了发送者和收信者的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世界是波普尔式的世界 3，是卡西尔的第三个基本现象：这是那个唯有通过意识才被给予，但是又拥有一个独立于意识的实存的东西。

而这，当然远远不只是一个悲剧。

结论

恩斯特·卡西尔对于三个基本现象的兴趣，似乎被他早年间对于歌德的原-现象概念的研究所预示；歌德的这个概念可以被展示为一个范畴，这个范畴对于理解一个从质的视角对自然的研究而言，乃是基础性的——这个研究参与了在其他的传统中已经被命名为生活世界、生态物理学和自然符号学的东西。符号学科学与传统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都是不同的；文化科学既是一般的，又被质性地定义。作为在文化符号学中发展起来的東西，自我、他人和他者的三分系统可以被认作是这种原-现象的人格化版本。然而，在它们背后，通过任何简单的方法，我们都没有找到这样一些基本现象：它们与卡西尔，并且部分地与皮尔斯式的第一性、第二性和第三性范畴相符合。这里特别重要的是第三个基本现象，亦即被客体化了的意義结构；与皮尔斯不同，卡西尔强调了这个结构。这个观点让我们可以解释三种交往科学——修辞学、符号学和阐释学——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具体地说，这允许我们把三种认识论操作与交往行为的诸例证联系起来。

参考文献

ARNHEIM, Rudolf.

1966. *Toward a Psychology of Art* (London: Faber & Faber).

AUSTIN, John L.

1962. *Sense and Sensibilia*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ACHELARD, Gaston.

1949. *La Psychanalyse du feu* (Paris: Gallimard). References are to the pocket edition, Collections Idées (Paris: Gallimard, 1971).

BAKHTIN, Michail.

1919–1924. *Art and Answerability: Early Philosophical Essays*, ed. Michael Holquist and Vadim Liapunov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0).

BARNOUW, Jeffrey.

1988. “‘Aesthetic’ for Schiller and Peirce: A Neglected Origin of Pragmatism”,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9.4, 607–632. <https://doi.org/10.2307/2709676>

-
- BATSON, C. Daniel.
2011. *Altruism in Hum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AYER, Thora Ilin.
2001. *Cassirer's Metaphysics of Symbolic Form: 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ENVENISTE, Émile.
1966. *Problème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Gallimard).
- BÜHLER, Karl.
1934. *Sprachtheorie* (Stuttgart: Fischer Verlag).
- ABAK REDEI, Anna.
2007. *An Inquiry into Cultural Semiotics: Germaine de Staël's Autobiographical Travel Accounts* (Lund: Lund University Press).
- CASSIRER, Ernst.
1910. *Substanzbegriff und Funktionsbegriff: Untersuchungen über die Grundfragen der Erkenntniskritik* (Berlin: Bruno Cassirer).
1921. *Idee und Gestalt: Goethe, Schiller, Hölderlin, Kleist; Fünf Aufsätze* (Berlin: Bruno Cassirer).
1923–1929. *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3 vols. (Berlin: Bruno Cassirer). Vol. 1, *Die Sprache* (1923); Vol. 2, *Das mythische Denken* (1925); Vol. 3, *Phänomenologie der Erkenntnis* (1929). Reprinted: 3 vols.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1964), trans. Ralph Manheim as *The Philosophy of Symbolic Form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3–1957). Vol. 1, *Language* (1953); Vol. 2, *Mythical Thought* (1955); Vol. 3, *The Phenomenology of Knowledge* (1957).
1928. *Zur Metaphysik der symbolischen Formen*, ed. John Michael Krois, Vol. 1 of Ernst Cassirer, *Nachgelassene Manuskripte und Texte*, ed. John Michael Krois and Oswald Schwemmer (Hamburg: Felix Meiner, 1995).
1942. *Zur Logik der Kulturwissenschaften: Fünf Studien in Götesborgs Högskolas Årsskrift* 48, 1–139.
1944. *An Essay on Man: An Introduction to a Philosophy of Human Cultur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5a. *The Myth of the State* (Published posthumousl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1945b. “Structuralism in Modern Linguistics”, *Word* 1 (August), 99–120. Reprinted in *Readings in Modern Linguistics* (8th ed.; Malmberg: Bertil), 78–98. (Stockholm: Scandinavian University Books, 1972). References are to the reprint.
- CLARK, Andy, and David CHALMERS.
1998. “The Extended Mind”, *Analysis* 58, 10–23.
- CONLEY, Thomas.
1990. *Rhetoric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DILWORTH, David A.
2014. “Gravity and Elective Attractions: The Provenance of Peirce's Categories in Friedrich von Schiller”, *Cognitio. Revista de filosofia* 15.1, 37–72.
- DONALD, Merlin.
1991. *Origins of the Modern Mind: Three Stages in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A Mind So Rare: The Evolution of Human Consciousness*. New York: Norton.
2010. “The Exographic Revolution: Neuropsychological Sequelae”, in *The Cognitive Life of Things*:

-
- Recasting the Boundaries of the Mind*, ed. L. Malafouris and C. Renfrew (Cambridge: McDonald Institute Mono- graphs), 71–79.
- DUNÉR, David, and Göran SONESSON.
 2016. “Encounters: The Discovery of the Unknown”, in *Human Lifeworlds: The Cognitive Semiotics of Cultural Evolution*, ed. David Dunér and Göran Sonesson (Hamburg: Peter Lang).
- ECO, Umberto.
 1976. *A Theory of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7. “The Influence of Roman Jakobs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Semiotics”, in *Roman Jakobson: Echoes of His Scholarship*, ed. D. Armstrong, and C.H. van Schooneveld (Lisse: Peter de Ridder), 39–58.
- FERRARIS, Maurizio.
 2002. *Historia de la hermenéutica*. (Mexico: Sigle XXI Editores). Italian original 1988.
- FRAZER, James.
 1890. *The Golden Bough* (London: Macmillan). Quotations are from a reprint edition (Ware: Wordsworth, 1993).
- GALLAGHER, Shaun.
 2005. *How the Body Shapes the Mind*.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GEERAERTS, Dirk.
 2010 *Theories of Lexical Seman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IBSON, James.
 1966. *The Senses Considered as Perceptual Systems*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82. *Reasons for Realism: Selected Essays of James J. Gibson*, ed. Edward Reed and Rebecca Jones (Hillsdale, NJ and London: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GIPPER, Helmut,
 1959. “Sessel oder Stuhl”, in *Sprache—Schlüssel zur Welt*, ed. H. Gipper (Düsseldorf: Schwann), 271–292.
- GLASS, A. L., K. J. HOLYOAK, and J. L. SANTA.
 1979. *Cognition* (Reading, MA: Ad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
- GOODMAN, Nelson.
 1968. *Languages of Ar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ULD, Stephen Jay.
 1999. *Rocks of Ages: Science and Religion in the Fullness of Life*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 GREIMAS, Algirdas J.
 1970. *Du sens* (Paris: Seuil).
- GURWITSCH, Aron.
 1974. “On Thematization”, *Research in Phenomenology* 4.1, 85–50.
 1979. *Human Encounters in the Social World*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85. *Marginal Consciousness* (Athens, Ohio: Ohio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 Donald,
 1998. *Visual intelligence: How We Create What We See* (New York: Norton).
- HUSSERL, Edmund.
 1936. *Husserliana: Gesammelte Werke. Bd 6, Die Krisis der europä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e Phänomenologie; eine Einleitung in die phänomenologische Philosophie* (Haag: Nijhoff, 1976).
 c. 8. *Erfahrung und Urteil: Untersuchungen zur Genealogie der Logik* (Published posthumously; Prag: Academia, 1939).

-
- HUTCHINS, Edwin.
1995. *Cognition in the Wi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JAKOBSON, Roman.
1963. *Essai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Paris: Seuil).
- KENNEDY, John M.
1974. *A Psychology of Picture Perception* (San Francisco: Jossey Bas, Inc.).
- KROIS, John Michael.
1987. *Cassirer: Symbolic Forms and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and the Embodied Cognition Paradigm: On the Convergence of Two Research Programs", in *Embodiment in Cognition and Culture*, ed. John Michael Krois, Mats Rosengren, Angela Steidele, and Dirk Westerkamp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273–290.
- LAKOFF, George.
1972. "Hedges: a Study in Meaning Criteria and the Logic of Fuzzy Concepts", in *Papers from the 8th Regional Meeting of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April 14–16*, ed. Petanteau et al.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83–228.
- LANIGAN, Richard L.
1995. "From Enthymeme to Abduction: The Classical Law of Logic and the Postmodern Rule of Rhetoric", in *Recovering Pragmatism's Voice*, ed. L. Langsdorf and A. Smith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49–70.
2010. "What is Communicology?", International Communicology Institute webpage: <http://communicology.org> (Consulted on March 1, 2016).
- LOTMAN, Yuri, B. A. USPENSKIJ, V. V. IVANOV, V. N. TOPOROV, and A.M. PJATIGORSKIJ.
1975. *Thesis on the Semiotic Study of Culture* (Lisse: The Peter de Ridder Press).
- MANETTI, Giovanni.
1993. *Theories of the Sign in Classical Antiquity* (Bloomington, India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MERLEAU-PONTY, Maurice.
1942. *La Structure du comportement*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References are to the 7th ed. 1972.
1945. *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 (Paris: Éditions Gallimard). References are to the reproduction in the series TEL 1979.
- MEYER, Michel
1999. *Histoire de la rhétorique* (Paris: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 MUKAŘOVSKÝ, Jan.
1974. *Studien zur strukturalistischen Ästhetik und Poetik* (München: Hanser).
- PEIRCE, Charles S.
i. 3–1913. *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Vol. 2 (1893– 1913)*, ed. Peirce Edition Projec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 Cited as EP2.
- PONZIO, Augusto.
1993. *Signs, Dialogue, and Ideology*. (Amsterdam: Benjamins).
- POPPER, Karl.
1972.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POSNER, Roland.
1989. "What is Culture? Toward a Semiotic Explication of Anthropological Concepts", in *The Nature of Culture*, ed. W. Koch (Bochum. Broch- meyer), 240–295.

-
- PRIETO, Luis.
1975. *Pertinence et pratique* (Paris: Minuit).
- RICŒUR, Paul.
1990. *Soi-même comme un autre* (Paris: Seuil).
- ROSCH, Eleanor.
1973 "On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Perceptual and Semantic Categories", in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the Acquisition of Language*, ed. Thomas E. Moore (New York and London: Academic Press), 111–114.
1975. "Cognitive Reference Points", *Cognitive Psychology* 7.4, 532–547. [https://doi.org/10.1016/0010-0285\(75\)90021-3](https://doi.org/10.1016/0010-0285(75)90021-3)
1978. "Principles of Categorization", in *Cognition and Categorization*, ed. Eleanor Rosch and Barbara B. Lloyd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27–48.
- ROSCH, Eleanor, and C. B. MERVIS.
1975. "Family Resemblances: Studies in the Structure of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7.4, 382–439.
- ROSCH, Eleanor, C. B. MERVIS, W. GRAY, D. JOHNSON, and P. BOYES- BRAEM.
1976. "Basic Objects in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8.3, 382–439.
[https://doi.org/10.1016/0010-0285\(76\)90013-X](https://doi.org/10.1016/0010-0285(76)90013-X)
- SCHILLER, Friedrich.
1795a. "Über die ästhetische Erziehung des Menschen in eine Reihe von Brief- en", in *Die Horen* 1795, 1, 1, 7–48; 1, 2, 51–94; 2, 6, 45–124. Quoted from Friedrich Schiller, *Theoretische Schriften, Dritter Teil*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66), 1–95.
1795b. "Über naïve and sentimentale Dichtung", in *Die Horen* 1795, 11. VIII, 43–76; 1795, 12, I, 1–55; 1796, 1, VII, 75–122. Quoted from Friedrich Schiller, *Theoretische Schriften, Dritter Teil*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66), 118–196.
- SCHÜTZ, Alfred.
1932. *Der sinnhafte Aufbau der sozialen Welt* (Springer, Vienna; New ed. Suhrkamp, Frankfurt/M., 1974).
1940–1955. *Collected Papers, Vol. 1: The Problem of Social Reality*, ed. Maurice Natanson (The Hague: Nijhoff, 1962).
- SEARLE, John.
1992. *The Rediscovery of Mind*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1995.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Reality*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SINGER, Milton.
1984. *Man's Glassy Essenc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ONESSON, Göran.
1988. *Methods and Models in Pictorial Semiotics* (Lund: Semiotics Project). 1989. *Pictorial Concept: Inquiries into the Semiotic Heritage and its Relevance for the Analysis of the Visual World* (Lund: Lund University Press). 1990. "Rudimentos de una retórica de la caricature", in *Investigaciones semióticas III. Actas del III simposio internacional de la 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semiótica, Madrid 5–7 de diciembre de 1988; volumen II* (Madrid: UNED), 389–400.
1992. *Bildbetydelser* (Lund: Studentlitteratur).
1994a. "Pictorial Semiotics, Perceptual Ecology, and Gestalt Theory", *Semiotica* 99.3/4, 319–399.
1994b. "Sémiotique visuelle et écologie sémiotique", *RSSI* 14.1–2 (Printemps), 31–48.
1994c. "Prolegomena to a Semiotic Analysis of Prehistoric Visual Displays", *Semiotica* 100.3/4 (July 1994), 267–332.

-
1996. "An Essay Concerning Image: From Rhetoric to Semiotics by Way of Ecological Physics", *Semiotica* 109.1/2, 41–140.
1997. "The Ecological Foundations of Iconicity", in *Semiotics Around the World: Synthesis in Diversity*; Proceedings of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IASS, Berkeley, June 12–18, 1994 (Berlin and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739–774.
1998. "The Concept of Text in Cultural Semiotics", *Sign System Studies* 26, 83–114.
1999. "The Life of Signs in Society—And Out of It", *Sign System Studies* 27, 88–127.
- 2000a. "Bridging Nature and Culture in Cultural Semiotics", in *Ensayos Semi-óticos, Dominios, modelos y miradas desde el cruce de la naturaleza y la cultura*, ed. Adrián Giménez Welsh; Proceedings of the 6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IASS, Guadalajara, Mexico, July 13 to 19 (México: Porrúa), 1005–1016.
- 2000b. "Ego Meets Alter: The Meaning of Otherness in Cultural Semiotics", *Semiotica* 128.3/4, 537–559.
- 2000c. "Iconicity in the Ecology of Semiosis", in *Iconicity*, ed. T. D. Johansson, M. Skov, and B. Brogaard (Aarhus: NSU Press), 59–80.
2001. "From Semiosis to Ecology: On the Theory of Iconicity and its Consequences for the Ontology of the Lifeworld", *Cultural Cognition and Space Cognition*, ed. Andrew Quinn, special issue of *VISIO* 6.2, 85–110.
2002. "Dos modelos de la globalización", *Criterios, La Habana* 33, 107–134. 2003a. "Three Scenarios for Globalisation: A View from Cultural Semiotics", in *Logica, dialogica, ideologica: I segni tra funzionalità ed eccedenza*, ed.
- S. Petrilli and P. Calefato (Milano: Mimesis), 385–396.
- 2003b. "Über die Möglichkeit von bildhaften Metaphern", *Zeitschrift für Semiotik*, 25.1–2, 25–38.
2004. "Does Ego Meet Alter—in the Global Village? A View from Cultural Semiotics", *Semiologia Culturii* 7, 95–119.
2006. "The Meaning of Meaning in Bi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A Semiotic Reconstruction", *Sign Systems Studies* 34.1, 135–214.
- 2007a. "The Extensions of Man Revisited: From Primary to Tertiary Embodiment", in *Embodiment in Cognition and Culture*, ed. John Krois, Mats Rosengren, Angela Steidle, and Dirk Westerkamp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Benjamins), 27–56.
- 2007b. "From the Meaning of Embodiment to the Embodiment of Meaning", in *Body, Language and Mind, Vol. I: Embodiment*, ed. T. Zimke, J. Zlatev, and R. Frank (Berlin: Mouton), 85–128.
2008. "Beyond Methods and Models: Semiotics as a Distinctive Discipline and 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in *Sign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miotics*, 277–319. Electronic publication: <http://vip.iva.dk/sis/index.php?journal=signs&page=article&op=view&path%5B%5D=17&path%5B%5D=51>
- 2009a. "New Considerations on the Proper Study of Man—and, Marginally, Some Other Animals", Special Issue: *Anthroposemiotics vs. Biosemiotics*, ed. Göran Sonesson and Jordan Zlatev, *Cognitive Semiotics* 4 (Spring), 133–168.
- 2009b. "The View from Husserl's Lectern: Considerations on the Role of Phenomenology in Cognitive Semiotics", *Cybernetics and Human Knowing* 16.3–4, 107–148.
- 2012a. "Between Homeworld and Alienworld: A Primer of Cultural Semiotics", in *Sign Culture—Zeichen Kultur: Festschrift for Roland Posner*, ed. Ernest W.B. Hess-Lüttich (Würzburg: Königshausen and Neumann), 315–328.
- 2012b. "The Meanings of Structuralism: Considerations on Structures and *Gestalten*, with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the Masks of Lévi-Strauss", *Segni e comprensione* 26.78, 84–101

-
- 2012c. “Semiotics Inside-Out and/or Outside-In: How to Understand Every- thing and (with Luck) Influence People”, *Signata* 2, 315–348.
- 2013a. “Divagations on Alterity”, in *Writing, Voice, Text: Festschrift for Augusto Ponzio*, ed. Susan Petrilli (New York: Legas), 137–142.
- 2013b. “The Natural History of Branching: Approaches to the Phenomenology of Firstness, Secondness, and Thirdness”, *Signs and Society* 1.2, 297–326. <https://doi.org/10.1086/673251>
2014. “Translation and Other Acts of Meaning: In Between Cognitive Semiotics and Semiotics of Culture”, *Cognitive Semiotic* 7.2, 249–280.
- 2015a. “Bats Out of the Belfry: The Nature of Metaphor,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Pictorial Metaphors”, *Signs and Media* 11, 74–104.
- 2015b. “Phenomenology meets Semiotics: Two Not So Very Strange Bedfellows at the End of their Cinderella Sleep”, *Metodo* 3.1, 41–62. Forthcoming. “Bodies without Souls and Behaviour without Meanings: A Critique of Radical Enactionism”, (in preparation).
- TESNIÈRE, Lucien.
c.1954. *Éléments de syntaxe structurale* (Paris: Klincksieck, 1959).
- THOMPSON, Evan.
2007. *Mind in Life: Biology, Phenomenology, and the Sciences of Mind*.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 TODOROV, Tzvetan.
1982. *La Conquête de l'Amérique. La question de l'autre*. (Paris: Seuil). 1989. *Nous et les autres* (Paris: Seuil).
1995. *La vie commune. Essai d'anthropologie générale* (Paris: Seuil).
- TVERSKY, Amos.
1977. “Features of Similarity”, *Psychological Review* 84.4, 327–352. <https://doi.org/10.1037/0033-295X.84.4.327>
- UEXKÜLL, Jakob von.
1928. *Theoretische Biologie* (Berlin: Springer). References are to the 1972 reprint ed. (Frankfurt/M: Suhrkamp).
- VARELA, Francisco, Evan THOMPSON, and Eleanor ROSCH.
1991. *The Embodied Mind: Cognitive Science and Hu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VERENE, Donald Philip.
2001. “Introduction: The Development of Cassirer's Philosophy”, in *Cassirer's Metaphysics of Symbolic Forms: A Philosophical Commentary*, by Thora Ilin Bayer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37.
- VON WRIGHT, Georg Henrik.
1971. *Explanation and Understanding*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ILEY, Norbert.
2006. “Pragmatism and the Dialogical Self”,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Dialogical Science* 1, 5–21.
- ZLATEV, Jordan.
2009. “The Semiotic Hierarchy: Life, Consciousness, Signs and Language”, *Cognitive Semiotics* 4, 169–200.